

两径轩杂文

方修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鄉土文叢

兩徑軒雜文

方修著



羣島文化社出版

1979. 12



出版：羣島文化社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馬里士他路五八四號

承印：五洲印務私人有限公司

定價：星馬幣二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版

目 次

题记.....	1
读「汉语音转学」随笔.....	5
「郁达夫选集」后记.....	18
答南方艺术团问.....	21
「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序.....	24
评分后记.....	29
读「翻书偶记」.....	32
剧人.....	36
文艺活动述略.....	39
文艺活动餘谈.....	52
新春试笔谈批评.....	59
一段回忆.....	63
方修编著书目.....	74

附 编（诗）

贺徐典兄调升正教授.....	81
----------------	----

附录：和方修先生贺林教授诗（望海楼主）

续得二绝句赠徐典兄·····	82
沁园春（感怀）·····	83
沁园春（却寄）·····	84
附录：沁园春——和方修先生感怀韵（岑兹）	
即兴二题·····	86
食红毛丹有感	
新山买榴莲口占	
题画二首·····	87
题檳城C君所赠农事图	
题柔州T君所赠熟食巴刹图	
「红楼梦新证」书后·····	88
附录：读「红楼梦新证」质疑（望海楼主）	
答寄·····	90
附录：寄所寄（望海楼主）	
闲读杂咏（四首）·····	91
水调歌头（读「比利自传」）·····	94
再答·····	96
附录：再寄（望海楼主）	
三答·····	97
附录：三寄（望海楼主）	
四答·····	98
附录：四寄二首（望海楼主）	
赠甄供先生·····	100
阅报偶得·····	101

红学读书记（一）	102
红学读书记（二）	104
红学读书记（三）	106
红学读书记（四）	107
红学读书记（五）	110



题 记

诗人们爱说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广阔，那些话在我是只有羡慕与响往的份儿。因为我的生活天地一向都很小，和诗人们所歌唱的完全相反。特别是十多二十年来，日子过得更加苍白，日常来回走动的不外几条熟悉的街路。这几条路，都以家里为起点，经常是：一，到报馆；二，到学校；三，到图书馆；四，到书店；五，到成药店。最近的几个月，连报馆学校都不必去了，图书馆也懒得上了，于是就只剩下书店和成药店两条死路在走着。本书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编成的，所以书名就叫做「两径轩杂文」。当然，所谓杂文，也只是指一些拉杂拼凑起来，按照写成的先后编排的稿件而已，并非冲锋陷阵的匕首投枪之类。

生活这么狭窄，稿件又这么芜杂，书的内容的贫乏，是不问可知的。不过有三两点关于编辑上的小事情，还想顺便在此说明一下。

一、「评分后记」这篇短文，本来有段「附记」，登出时被删掉了。现在检出底稿，照补上去。

二、望海楼主的几首诗，奖饰太过，愧不敢当，发表时迫得改动了若干字眼；但又改得很蹩脚，心里一直深感不安。现在原句已经淡忘，我与诗人又只是神交，未有联络，因此无法补正。这里只好将错就错，希望将来作者出版诗集时自己根据底稿还原吧。

三、「红楼梦新证书后」，是近年来看了香港杂志上许多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论争文章之后引起的一点感想，并非特别针对「读红楼梦新证质疑」一诗而发。这里所以把这首「质疑」作为附录，原因是我手头所有的其他有关资料都是一些长篇大论，转载不便；而此诗短小精悍，最省篇幅，故予录入，以供读者参考。这是要请诗人和他的畏友梦楼女史谅解的。

最后，可以一提的是那篇「方修编著书目」，这是我为了自己的方便而编出的。本来，「小休录」出版的时候，洪炉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已经在书的封后给我列了一单「本书作者其他编著」，算起来也有二十二、三种，照说那已经是太过浪费油墨了，我也告诉过出版社这么浪费是不值得的，为什么现在我自己又要来这一套呢？

事缘南洋学会的C先生，前些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是澳洲某大学有位研究员，来信托他代买我的书，写的编的，全部都要。C先生问我除了「小休录」封后所载的书目之外，还有什么有关的出版物可以「介绍」。于是我想到上述的书目，在编纂部份似乎漏了一些东西。但究竟漏了那几种，我一时又说不出确切的名目来。事后我也感到，要提我的编著书目，在「编」的这一部份，确也有点混乱，不易讲得清

楚。有些书，虽然说是我编的，其实真正做了点编辑工作的，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另一部份不过协助选定稿件，或者把作者自己选定之后送来的书稿照排如仪，然后校阅一遍吧了。又有些书，我没有挂名做编辑，但辑录、选稿、编纂、校阅等等工作，从头到尾又多是我做的。这些情形，我一时也清理不出来，难怪答问时要交白卷了。

另一方面，我又感到，我所编纂的别人的作品，内容大多比我自己写的东西好过百倍，倘要整理我的编著的书目，倒应该着重编纂的部份才对。也就是说，与其向读者介绍「马华新文学史稿」或「马华新文学简史」，不如介绍一册「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或「郁达夫选集」；与其推销「长夜集」或「轻尘集」，不如推荐「铁抗作品选」或「张天白作品选」。这样，才不至于使到读者们舍本逐末、买椟还珠。

因此，为了我自己的备忘，为了少数全面搜购本地书籍的热心读者的需要，我把我的编著书目重新编了一下。办法是把「小休录」封后的那一份加以扩大，原有的「著」的部份照抄下来，另外增加了「纂辑」、「编辑或校阅」，及「选定」等三项。将来，如果又有一两位宽大而慷慨的顾客到来搜罗冷门书，不嫌内容的简陋或资料的陈旧，竟然点到我的「货色」，要我一一报出书名来，则我就直接提供这一份书目让他们去「按图索骥」，不需我自己再来检视旧篋、搜索记忆了。

方修·一九七九年七月廿四日

读「汉语音转学」随笔

(一)

同事戴淮清先生的音转学著作，刻在排印中，拟自费出版。他把稿件的副本交给我，叫我写序。要外行人来讲内行话，这无异是在开玩笑。没办法，只能写几段因戴先生的文章引起的琐碎的感想。

据我所知：戴先生的著作分篇在报章上发表的时候，读者们的反响是见仁见智，赞否不一。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曲高和寡、看不懂。

如果这是实话，我倒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这些文章我大体上是看懂的。这也许是作者所涉及的一些语言声韵的常识，我都有了一点的缘故。

我从未认真地读过一册文字学或声韵学之类的专著。但年轻时却学过三两年旧诗词，常常在平仄四声中兜圈子，那本「诗韵集成」也几乎翻破了。更早时候，还接触过潮语十五音，对于所谓反切——中国传统字书的注音法，一度摸得

烂熟。这些可能是我看懂了戴先生的文章的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我不谙洋文，连几个粗浅的英文的发音也都十分蹩脚，但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却先后学过一段时候的中国拼音文字，从国语罗马字到拉丁化新文字，从什么赵元任方案到瞿秋白方案，大多涉猎了一遍；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现的若干汉语拼音新方案，也尽可能找来看看。这些偏门「杂学」，使我熟悉了一些拉丁字母的性质以及拼写变化等等特点，因而也有助于我对于戴先生的谈论音转问题的理解。

然而，这祇能说明我还可以欣赏这一部音转学的著作而已，距离写序的资格是太远了。（73.12.17）

（二）

这几天把戴先生交来的一批音转学的稿件粗略地看完了。我觉得一般读者所以认为这些文章深奥难懂，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在于文章的内容，而是对于音转学的本质及戴老的著述旨趣不大清楚的缘故。如果解除了这一层疑难，再来看这些作品，相信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们假定，很早的时候，人们常常是采用单一的某个音或字来表达某种意象的。这些单一的音或字，由于经过了无数个世代的流传转播，以及人们的拓殖迁徙而造成的地理上的隔阂，音的念法和字的写法，乃不断地蕃息，生发，分化，一变再变，终于形成了今天的许多读音不同，形体不同，而意象却又相通的同义字。但这许多的同义字的来源，或其演

进流变的情形，却是大都有轨迹可以探寻的。它们常常有其共同的语根，有其内在的联系。音转学，可以说就是研究这种语音和字形的展转演变的线索或规律的一门科学。戴老的音转学的著作，就是在发表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心得；同时又进一步地把这些心得用于具体的考证工作，如解释古书的疑义、辨证古代的地名，追溯某些汉字的原始的音义等等。这一门研究工作，性质与中国传统的文字学家的所谓转注之学相同。不过戴老所开辟的境界，远较前人幽深博大；运用的方法也比前人更新、更科学；因而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或提供了许多新的发见。

这样地把戴老的著述的性质及旨趣弄清楚了，再加上一
点耐心和一点英文的拼音常识，则这些文章是一定可以看懂
的。

(74、2、4)

(三)

何以说阅读戴老的文章要有一点耐心呢？原来这些音转学的著述，乃以札记的形式写成。作者读书得间，随手录出，零星凑集，每条自成起讫，不象一般教学讲义那么显得有统系，有组织，纲举目张。这些札记的编次排比，也不大讲究归类，举凡字义的训诂，字源的追索，字音字形递变的探讨、物名的考证等等，常常合并在一篇长文之内，如「以音转原理正名辨义」一文就是。因而读起来可能觉得琐碎、散漫、杂乱，必须放慢速度，细心领会，没有阅读其他结构齐整的编著那么轻便，这就需要一点耐心了。

然而，这一点耐心的付出是值得的。戴老的作品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系统性，而是在于它的独创性。这些零零星星的简赅的札记，几乎每一条都是一个匠心独运、功力深厚的新发见，而且富于启示意义，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研究专题。正如作者自己在考证出尚书的黑水即是长江之后所说的：“余不欲引经据典作洋洋数万言之长文以为证；余无暇及此，亦不屑为之。但史地学生之欲写博士论文而苦无题目者，大可写一篇「大禹足迹考」，兼叙黑水与三危”。这不见得是故作豪语；事实上独创性比较强的学术文字，往往具有这种先驱的作用，发展的潜能。王瑶得到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学与酒及药之关系”一文的启发，终于写成了三册中古文学史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的生活」，「中古文学风貌」，就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74，2，11）

(四)

我的认为多用一点耐心来读戴先生的音转学的作品是值得的，还不单是因为戴老的文章独创性强，新发见多，同时也因为在这些虽然零碎的札记里面，常常可以窥见作者运用其过人的思考力，在学术的疆域中上下求索的过程：怎样发现问题、摸索方向、提出办法、以至于解决问题，较之阅读一般教科书式的专著，可说另有一番趣味。兹举作者探讨“文质彬彬”一语的释义为例。

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郑注：「彬彬、杂半貌」。若照郑注解

释，则下两句犹言 文与质参半，然后得谓之君子。然证诸其他典籍，「彬彬」却非杂半。……然则，彬彬”应作何解？聊询数位学友，所答亦纷纭。某甲曰：「彬彬有礼，如戏台上之小生」；某乙谓：「彬彬谓斯文」；丙曰：「彬彬谓郎才」。因各人意想不同，解释亦各不同。中文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说文：「彬彬、文质备也」，此亦非最佳之解释，但已比郑注为胜。辞通作者朱起凤知与「彬彬」同义者有「份份」、「斌斌」、「分分」、「斑斑」，然所引之例证亦不足阐明「彬彬」之真义。余沉思数日，某夜忽想起「玢」字，立刻起床翻阅字典，果然觅得线索。线索已得，「彬彬」之意义自明。「彬」与「玢」均读如「宾」bin，加g则为「彪」bing。「彬」bin转ao则为「彪」biao，故“彬彬”实犹「彪炳」也。……玉之花纹谓之玢，后来借以形容文采鲜明之物，更借以喻多姿多采之学士。……

如果作者为了强求书的结构之齐整，去「芜」存菁，祇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文质彬彬」尽可译为「文与质俱彪炳」、「品学兼优」、或「学问与品性均昭彰」，则读来虽然便当，却也索然无味矣。（74.2.18）

（五）

上文解释了阅读戴先生的音转学的作品所以要有一点耐心的原因。现在再谈谈这些文章的欣赏又何以要有一点英语

拼音的常识。

这是因为，戴老对于音转问题的论述，在注音方面，用的不是「国语注音符号」，而是本地通行的洋文拼音。例如下列一段：

视 sh 加 n 声则为审 shen，视 sh 加 u 为熟 shu，审 shen 转 u 亦为熟 shu。因此，「熟视」犹「审视」，「审察」犹「视察」也。视 sh 加 ng 声则为省 sheng，「省亲」即「视亲」之谓。论语：「吾日三省吾身」，此犹言「余每日三审吾身」也。与视 sh 同音之识 sh 加 ng 声亦为省 sheng，例如「不省人事」。……

这大意是说，「sh」是视、审（熟）、省、识这些字的语根，也可能是人们表达「视」这个意象的较原始的语音或字音；但由于几千年来的辗转流变或分歧发展，乃演化为这许多不同形体的同义字。它们之间，读音不尽相同，但声母相通（sh），有的连韵母也相仿（审，省），可以窥见彼此间的关系。作者在这里便是用洋文拼读法来注音，以说明其间变化的痕迹。

作者以洋文字母来注音，取代「国语注音符号」，我想一方面是由于印务馆没有「注音符号」的铅字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采用这种表音文字来标音，较之采用「波泼么」等三十七个图形，在视觉上更容易显出有关语音的转化演变的线线；如 sh，shen（—shu），sheng 等，其变化的脉络，可谓一目了然。不过这么一来，读者们就得有一点

洋文拼音常识，才能够充份的欣赏。好在这祇是一种常识，凡是学过一点A B C的拼读法的，就都可以应付了。因而看懂这些关于音转学的文章，完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74, 2, 25)

(六)

要欣赏戴先生的音转学作品，一点拼音常识是需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如果不懂得一点A B C的拼读法，就完全无法欣赏这些文章。

戴老的文章，基本上是根据音转原理来进行训诂考证的工作的。但实际上谈论音转原理的文字并不多，更多的篇幅是在发表他在训诂考证的工作上的收获。读者们如果不谙蟹行文的拼音法，或者对于音转的阐释没有兴趣，尽可跳过这些段落，直接领略作者对于问题的研究成果。这样，比较去看什么文集诗选的校注、通释、笺解之类，将是更有趣味，也更有益处。

譬如作者考证了「凡」「泛」「般」「普」「浮」……等字在昔时本是音义相通之后，论断道：「凡人」即「普通人」，「凡例」即「普通原则」，「凡尘」之义与「普天之下」相同，两者均为仙境之对。「大凡」等于「一般」，「诸凡」与「举凡」等于「诸般」，「泛泛」即「普遍」，「肤泛」即变相之「普泛」或「浮泛」，「以奏肤功」犹言「以奏敷功」或「以奏普功」，即「以奏大功」之谓。「泛海」与「普渡」相同。……

我们对于「凡例」、「举凡」、「肤泛」、「肤功」这些词语，向来祇知道一个大意；虽然也可以应用，但对于字义并没有很明晰的认识。一般字典以及书本上的注释，也往往不会令人满意。现在经戴老这么寻根究底、深入浅出地发挥一番，印象就深刻得多了。诸如此类情形，这一批音转学的作品中可说所在多有，即使不解音转原理，读之也当获益非浅。

(74、3、4)

(七)

戴先生的音转学著作，在报刊上分篇发表的时候，读者中除了觉得曲高和寡、看不懂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的反响，其中一种是：阅读上没有多大问题，但对文章的内容抱着保留的态度。

这种保留的态度主要是针对地名方面的考证，特别是关于若干南洋的地名。有些读者怀疑南洋的地名，是否古今一致。如果是今昔异名，或者在几千年前根本就有地无名，甚至连地都还未曾突出海面，则某些考证岂非成了无的放矢？譬如，我们说中国古书上的歌营国或加营国，即今吉隆坡附近的加影，然而马来亚的古代史竟究有无加影其地其名？又是否有人在此立国称王？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查考的。

我于地理之学，一窍不通，对这方面的是非，完全无从置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戴老的「以音转原理考证古代西域地名」与「以音转原理考证古代南海地名」二文，无论如何不失为两篇精彩的力作，甚至于可说是作者治音转学

以来的最大贡献。因为这里面提出了许多新的发见或与前人不同的论断；这许多发见与论断，又不象一般动词或状词的考证那么属于微枝末节，无关宏旨，而是常常牵涉到一些地理学上的大问题或者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值得学术界注意的。例如，作者指出：「扶桑」即「富士山」，所以成为日本的代称；大禹所到的「孙朴」与「续满」，即是「三佛齐」与「苏门答腊」；「三危」不是敦煌东南的三危山，而是长江三峡；「条枝」不是伊拉克或叙利亚，而是土耳其；「大秦」也不是罗马帝国，而是「雅典」……。凡此种种，祇要有三几处说对了，揭开了千古哑谜，也就足以不朽了。纵使偶有一两点证据不足，显得牵强，也是瑕不掩瑜，无损于这批文章的价值的。

(74, 3, 11)

(八)

前回谈到戴先生的音转学著作中若干关于南洋地名的考证，有些读者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据我所知，在文字训诂方面，也有一部份读者曾表示怀疑。他们通常祇能同意某些浅显的、比较表层的音转现象的解释，不能接受深入的、复杂的穷源溯流的研究。

譬如下列一段——

m, w 乃通转之声。例如广府人读「晚」wan 如man。「晚」man 转u为「暮」mu，再转ei 则为「昧」mei。「暮」mu加ng 为客话之「蒙」mung，再转i 则为「冥」ming。「晚」wan 或广

府话之「晚」man，弃w或m则为「暗」an，再转i则为「暖」ai。「暖」加d为「逮」dai，「暗」an转鼻音则为潮语之「晏」。……

一部份读者就只能同意wan与man，「暗」与「晏」之类是音转的现象，至于「暮」「昧」，「蒙」，或者「暗」，「晏」，「暖」等等，就不相信都是音转的产物。

这一方面，笔者倒是赞同戴老的论述的。我认为一些比较浅近的异声同韵、或同声异韵的同义字，只要对于语音问题稍有留意的人都不难于领会，一般文字学的书也大多会谈到的，读不读戴老的文章都无所谓。至于对许多音转线索比较暗晦的同义字的索隐揭秘，那才是值得重视的新发见，也正是戴老的研究成绩中的精华。如果舍去这批精华而祇接受一点文字学上的常识，可就等于买椟还珠，得益甚微。

其实，只要想到汉字的字音字形的演化发展，不是几十年、几百年，而是几千年的历史，则对于从man到「暮」、「昧」、「蒙」、或者从wan到「暗」、「晏」、「暖」这类比较曲折、隐晦的关系，应该是不会觉得奇怪的。如果，经过了几千年的递变生发，结果祇产生了类似wan，man，或「暗」「晏」这种显而易见的音转现象，那反而是值得诧异了。

(74、3、18)

(九)

昨晚翻阅本地新到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第一册)，在「屈原与楚辞」一章，见刘氏举出「诗经」

和「楚辞」各一段，对照比较，指出「诗经」中的语助词「思」字和「楚辞」的「些」字，只是一声之转，意义和用法都相同。刘氏所举例证如下——

诗经：「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楚辞：「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

这些，本来是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早就说过了的，但此刻读来却是印象特别深刻。原因大概是被迫冒充内行，要替戴老的「汉语音转学」写序，则对于有关音转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比较留意起来。

刘大杰所举的例子，正好说明了汉语音转现象的复杂与曲折。从「诗经」到「楚辞」，时间不过三百年左右，然而作为语助词的「思」字，却已经衍变为「些」字，如非文字学家加以比较研究，道出此中音转关键，我们几乎联系不上来了。

汉语音转现象的复杂曲折，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明。笔者平日听几位江浙籍的朋友讲方言，发觉凡属 t, th, n 声开头的字，很少会跟 an, ang, 或 ing 之类韵母结合的。譬如「电」，「天」，「年」，常常读如「碟」（去声），「叠」（平声），「尼」。试想，这一系的方言，如果处在一个交通阻隔，与其他语言系统无从交流的孤立状态之下，不断推演发展，那么，再过三几千年之后，许多字的读音，与目前普通话的距离岂非愈来愈远？而在此递变过程

中产生出来的许多声异义通的「别字」，不就是一批源流暗晦，不易捉摸的同义字了吗？ (74, 3, 25)

(十)

前些时在一个宴会上听C君提起，他的同事中有一位老教师，不但是戴先生的音转学著作的忠实读者，而且对于戴老推崇备至，赞不绝口，说是「戴淮清这个人真是了不起。」

这可以说是读者们对于戴老的文章的另一种反响。

这一句「了不起」的评语，真正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据笔者推想，主要恐怕还是指的戴老的研究工作的深度与广度。戴老对于错综纷繁的音转线索，追踪蹊迹，穷其源流，动辄揪出一批数量惊人的同义字来，在训诂方面，大大突破了前人的成就，这是最容易欣赏的一点。兹再举一例于下——

「怡」或融泄之「泄」，音 yi，转 u 为「误」、「愉」、或不豫之色之「豫」yu。「豫」加 eh 为「悦」yueh。「怡」加 ou 为悠然自得之「悠」或优游之「优」与「游」yiou。以上九字转 ng 则为融泄之「融」yung。娱、愉、豫 yu 转 sh 为「舒」shu。「舒」弃 u 为「适」sh。适与舒加 ng 则为爽快之「爽」shuang 或「祥」siang。怡 yi 转 sh 为「喜」、「熹」、或「禧」shi，以上三字加 ng 则为「兴」shing。「兴」转 c 声为「庆」ching。又熙、喜、熹、或禧加 a 为融洽之「洽」或惬意之「惬」shia。惬亦读如「切」chieh，

转n则为「慊」chian。……「慊」转ng则为称心或称快之「称」cheng。因shh通转，由「惬意」转为「合意」。「悠」yiou转ao为「陶」yiao，故「陶然」犹言「悠然」或「怡然」也。陶然之「陶」不宜读如「桃」。……

原来，从泄、怡、愉、豫到舒、适、祥、熙、再到喜、兴、称、庆、悠、陶、融、惬……等数十字，都是同根生出的几条藤上的瓜果，声近义通，由某一个单一的语根或字源生发演变而来的。

总之，这是文字学上的一片新大陆，如果不是戴老的探索与发现，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门学问，竟然还有这么宽广的天地呢。

(74 . 4 . 1)

〔郁达夫选集〕後记

大约由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了编写《马华新文学》的教学讲义以及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我把战前星马大批报章副刊重翻了两遍。除了影印所需要的资料之外，也集中地辑录了个人所偏爱的若干作者的作品，准备得暇时为他们各人编印一册集子。郁达夫的遗文也是当时蒐集的重点之一，先后获得他在「星洲」「总汇」两报发表的短评、游记、政论等百余篇。

后来，林徐典先生为世界书局主编《星马报人文丛》，认为有需加入一册郁达夫晚年的作品，于是我把手头的资料略为整理，编辑成书，交林先生寄港排印；并由林先生定名为《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时为一九七二年年中。在当时来说，这是唯一的一册比较完整的郁达夫晚年创作集。

不料稿件发排之后，却如石沉大海，一连两三年没有消息。查询之下，原来书稿早在递寄的时候失落了，迄仍遍寻不获。这一来，大家都有点意兴索然；虽然我还存有一份粗略的副稿（稿照的复印），也懒得再去整理了。而且，这时

候（一九七四年），日本的东洋文库已经出了一册《郁达夫资料补篇（下）》，由于成书较晚，对于郁氏遗作的搜集，也较《郁达夫抗战论文集》进了一步。我们认为，郁氏的遗文既然有了更为完整的专集出版，则《郁达夫抗战论文集》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稿件失落也就算了。

不久，听说东洋文库的《郁达夫资料补篇（下）》，因为印数太少，没有公开发行，香港有些书局便把它拿来翻印兜售，每册索价九十元。我们的想法因此有了改变。觉得郁氏晚年的比较完整的遗著，还是应该重遍一册出来，广泛印行，以应读者的需求。

去年，张笳同学进星大研究院深造，论文的题目恰好是郁达夫晚年作品的研究，并且陆续搜集了不少有关的资料，于是我建议由张君编一册《郁达夫选集》，列入万里书局计划出版的《马华文学选集》丛书中。编法是以我处所存的《郁达夫抗战论文集》的副稿及东洋文库的《郁达夫资料补篇（下）》为底本，侧重较有文艺性的部份，再补充一些新的发现。

没想到在编辑的过程中，一度遍寻不获的《郁达夫抗战论文集》书稿，却又失而复得，在三四年后无意中被发见，而且排好了版，打了小样，由港寄星校阅，准备付印了。这个意外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郁达夫选集》的编辑工作究竟要不要继续下去呢？

考虑的结果，我鼓励张君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理由有下列几点——

一 《郁达夫抗战论文集》偏重于政论，和本书的着重于文艺性稿件有些不同，而且正好相辅相成，合起来差不多等于郁达夫晚年作品的全集。

二 东洋文库的《郁达夫资料补篇（下）》没有公开发售，本书内容和它虽有重复，也不大要紧，反而正好借此破除翻版书商居为奇货，漫天开价的现象，对于读者是有益的。

三 本书加收了若干崭新的资料，如短文《为星中日报四周年纪念作》、《报告文学》、译稿《马尔泰岛》、《中国出海新路》……等，均为其他各本所无。

四 本书辑录的郁氏晚年所作旧诗，最为全面，可补坊间现有各种郁达夫诗词集的不足。

以上是本书编印的缘由与经过的大致情形，叙述出来，也许不是多余的。至于对于郁氏晚年作品的深入的评介，就要待看张君的研究成绩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

答南方艺术团问

——关于战后话剧活动

问：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话剧活动情况如何？

答：四十年代初期的马华话剧活动就是当时的救亡戏剧运动，这在我的一些关于战前的马华文学史话中已曾述及。五十年代则有狄原的一篇「五十年代上半期星洲表演艺术活动」（一九七四年实验剧场演出特刊）可以参阅。这以后的情形，大家比我熟悉得多，不须我来喋喋。现在要谈就只能谈一点四十年代后期——即星马光复后以至紧急法令颁布前（一九四五——四八）这一段的情形。

问：这时期有那些话剧团体？

答：这时期可以说是马华戏剧的中兴时期。经过了日本侵略者三年半的摧残蹂躏之后，马华戏剧界在这时期重整旗鼓，恢复活跃，戏剧团体纷纷涌现，不计其数；有的是旧有团体的改组，有的是新成立的剧团，有的是附属于一般性社团的组织，如青年会戏剧组、妇女会戏剧组等。确切的统计数字是没有的，许多剧团的名称也淡忘了，特别是联邦方面的。就新加坡方面说，较有印象的是爱华社、铜锣合唱团、

海鸥剧团、民声歌剧社、星洲实验剧团、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等几个。外来剧团最有名的便是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

问：这些团体上演过那些作品？

答：爱华社演过「血泪仇」、「茶馆小调」、「小放牛」等短剧；铜锣合唱团以音乐造型形式演过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海鸥剧团演了「升官图」（陈白尘）和「岛上夜曲」；民声歌剧社演出「宝星」、「王八蛋才疯」、「没有规矩的规矩」、「五祖庙」（巴人？）等作品；星洲实验剧团演过「前夜」、「雷雨」、「巧妇人」、「两个患难的朋友」，又在怡保和檳城演出「梦的毁灭」、「大义灭亲」、「重逢」、「狂欢之夜」等剧；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演出的有「裙带风」（洪漠、潘子农）、「油漆未干」（赵如琳改编）；「中艺」的节目则有「重庆廿四小时」、「风雨三条石」、「风雨牛车水」等。

问：这些剧本内容反映些什么？

答：剧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作品。主要是反映沦陷时期本地人民抗日卫国的艰苦奋斗，以及战后初期星马社会的种种悲惨现象。主题是反对恢复殖民统治，要求独立自主。「南岛夜曲」、「没有规矩的规矩」（描写战后初期女工生活）、「风雨三条石」等属之。另外一类是中国剧本。主要是反映中国方面政治的腐败糜烂，人民生活的苦难困厄，以示民主改革的急不容缓。「裙带风」、「重庆廿四小时」等属之。当然，这类剧本对于本地也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与教育作用。

问：这些戏剧在什么场合演出？

答：联邦方面我不大清楚，新加坡方面的演出场所大多是维多利亚纪念堂和大世界游艺场的戏台。也有一部份在一些团体的会所和学校的礼堂演出。

问：多数的演出是什么性质？义演？筹款？

答：各种性质都有。有的是例常的演出，有的是学习成绩的汇报；有纪念性的，也有职业化的。如星洲实验剧团，就是靠门票的收入来维持团员的生活。义演、筹款的也有。如「中艺」在新加坡时，就曾为本地的福利部义演；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的「裙带风」，则是为筹款建校。

问：演出时用什么语言？观众反应如何？

答：大部份用普通话演出。观众反应则视演出内容而定。有些剧本不大适应观众的要求，场面比较冷落。但「中艺」的一些歌舞剧，反响却很热烈，许多观众一看再看。海鸥剧团的「南岛夜曲」和星洲平民学校的「万世师表」，记得也颇受欢迎。

问：这时期的话剧活动有那些优缺点？

答：一般说来和当时的社会运动尚能相适应，尽其教育群众的任务。但剧本的选择似乎不够严格，演出内容与群众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此外，本地创作太少，有些比较优秀的本地剧本，未能及时搬上舞台，也是一个缺点。

（一九七六年十月）

〔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序

拙著「马华新文学史稿」的英译本即将付印出版，主持翻译工作的生田先生从东京来信，要我替这个译本写一篇序言。我一向不善于撰写序跋这一类的文章，近年又特别爱好郁达夫的一句诗：「往日牢骚今懒发，发了还愁丢丑」，而且引为同调，这就更加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然而，我还是不揣谫陋，非常乐意在这里向英译本的读友作几句应有的交代。

「史稿」的中文本原书，实际上并不象是一册文学史，至少不是一册正规的文学史；但也不是纯粹的史料。它是一种四不象的东西，差不多等于一册出版工作考证、作者作品介绍、以及文学事件评述的合编。当时所以大胆地称它为「史稿」，祇是因为它毕竟还稍微具有这么一个特点：为太平洋战争发生前二十多年间的马华新文学发展过程描绘出一个粗略的轮廓。这个轮廓虽然极其粗略，但对于当时的一般人来说，简直还是一件新闻。当然，如果拿本地的一些南洋史的著作来衡量，它实在是十分幼稚的。因为在星马地区，南洋史的研究已经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所以根基深厚，不

乏比较成熟的史著；而马华文学史的整理，却还是一种草莱初辟的工作。

但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英译本，却又和原来的中文本不大相同。它是象样得多了。这是生田先生和英译者麦唐纳博士花了好几年的心血、对于原书的内容作了一番斧削和重组的结果。英译本的一些图表和附注，也是原书所没有的。这同样是生田先生和麦唐纳博士的贡献。友邦学人对待出书工作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委实使我敬佩不置，也使我感到十分的惭愧。因此，英译本的读者，对于本书如果还能觉得清简好读而得以欣然终卷，那么，这完全是生田和麦唐纳两位先生的劳绩。

中文本原书的写作，始于六十年代初期。它是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诞生的。据我所知，在其他国家，文学史的编写，总是在文学作品的单行本大量刊行，许多作家已为读书界所熟知，甚且已有一定评价以后的事。然而，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星马，情形却正好相反：时代需要我们对于太平洋战争前一段时期的马华文艺活动作出一个初步的总结，而我们的前辈作家的作品，却是连一册单行本也难以见到。不但如此，大家对于马华新文学的历史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发展梗概怎样，有些什么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等等问题，也都几乎茫然无知。原来，战前的马华文学作品，绝大部份发表在一些报章副刊上面，小部份发表在几种定期杂志上面，印成单行本的只有寥寥的三几册小说集。现在，经过了几次兵灾人祸，定期杂志十九荡然无存，几种单行本也大都绝了版，硕果仅

存的祇是一批旧报章的合订本，堆积在一间学校的图书馆里，成为该馆庋藏的珍品，一般人都不易接触到，这就造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段「空白」了。然而，也好在图书馆还保存了这一批旧报章的合订本，使到这段文学史的「空白」有可能加以填补。虽然一时还不够条件来大量地编印前辈作家的文集，写一册历史却是勉强可以办到的。这样，马华新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就本末倒置地提前来做了。

当时，图书馆还没有复印机和自动冲洗影印机的设备，所需资料，要靠手抄。天天赶到几英里外的图书馆去抄，一个字一个字抄，一个人抄不了许多，就多请一两个朋友帮忙抄。仅仅一些作品的篇名，就抄了好几个月。此中甘苦，只有身经者才体会得到。但即使如此，很多篇幅较长的小说和剧本，还是无法全篇抄出，而只能摘录某些段落，或者商请图书馆当局代为摄影。然而摄影也有摄影的麻烦，没有目前使用自动冲洗影印机那么方便，这样，资料的搜集就不完整。实际上，累积了二三十年的史迹，包含了无数优秀作品的大批资料，一时之间也不可能搜集得很完整，加以人事倥偬，室无储粮，更不容你长期呆在图书馆里翻翻抄抄。于是，「马华新文学史稿」的中文本，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利用手抄所得的一些副刊篇目，作品片段，以及图书馆代为拍摄的部份照片，开始拼拼凑凑起来了。凡是读过中文本的人都会感觉到，书中的好些部份，实在「凑」得十分的勉强。现在的英译本，相信也还存在着不少这类「先天不足」的缺点。这方面，我得说明，应该受批评的是原作者，英译者是无能

为力的。生田和麦唐纳两位先生，已经是尽可能加以补救，大大地提高本书的可读性了。

生田先生主持本书的英译工作，大约是从七十年代的初期开始。在这前后，我自己对于有关资料，有了较深一层的发掘，并先后出版了几种同性质的小书，如「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马华新文学简史」等，内容自信会比「史稿」结实了些。有一回，我向生田先生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改译比较晚出的「马华新文学简史」。但生田先生认为还是应该按照原定计划先译「史稿」。一来因为「史稿」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半，不便更易；二来「史稿」是早期之作，文字上带着一点壮年人的热忱，也自有其优胜之处。最后这一句是生田先生的奖饰，不能当真的。现在，我是这么想：对于希望了解一点马华文学动态的友邦人士来说，有了「史稿」的英译，确也是差不多了，不应该再去浪费物力了。不过读友中如有兼晓中文的，却也不妨看一看前文提到的「简史」。里面对于「史稿」中一些疏漏的地方，算是有了适当的补充。

末了，还有一点可以告诉英译本的读友的。在星马，特别是战前的这一阶段，并没有所谓专业作家。当时，大多数的写作人是记者、教师、工人、学生、以及一般职业青年。这些人都不为写作而写作，或者为成名而写作。他们的写作，祇是为了有着太多的感情和愿望要诉说，为了殖民地的现实引起他们太多的不满与不平，为了抒发他们的强烈的爱憎，为了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他们无意成为作家，出版专集，

更不会想到数十年之后有人会来搜集他们的作品，编文选、写历史。相反的，他们倒是希望那些作品和那个可咒诅的时代一同消逝的。因而，他们的许多创作几乎都成了「赶任务」的「急就章」，现在看来可能会觉得不够精致或凝炼。但了解了这种情形之后，我相信读友们是会赞赏他们的精神而原谅他们的粗犷的。

（一九七七，四，廿五。新加坡）



评分後记

——为一九七七年度星大中文学会
主办文艺创作比赛颁奖礼作

今年星大中文学会主办的创作比赛，我看稿的时间更少，（只看了一部份诗歌和散文，）评分也更马虎。大体上是把稿件按内容和写作技巧分为两三个等级，每一级给以一个相同的分数，譬如同样是六十分或七十分。这就是说，作品是否录取，以及录取的作品的名次的先后，主要还是由其他评判先生决定。其实，前一两次的创作比赛的评分，我也是采取这个办法，不过这一次是更加草率吧了。

内容方面，我比较注意作品的生活描写的广度。原因是我觉得这一次参加比赛的一般稿件，在取材上颇有「差不多」的倾向。本来，生活是无比广阔的，作品的取材如果局促于一隅，则内容纵然极有意义，看多了也难免有单调干瘪之感。因此，在评分时我特别着重题材的多样化。有几篇作品，思想性并不高，但我给以较多一点的分数，那就是认为这些不同题材的作品，合起来可以成为一幅比较丰富多采的生活图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其他的评判先生也

各有各的标准，作品入选与否，要看平均分数。

就我个人看到的少数稿件来推测，这一次参加比赛的作者，似乎是又一批新人，与前此两届的参加者不同。这是可喜的现象，说明马华文艺近年来虽然境遇不佳，但始终有人在写，有人在努力，仍然维持着优良的创作传统；而且每隔三几年，就有一批生力军涌现出来，虽然阵容没有以前某些时期那么壮盛。尤其难得的是，这一次的一批新人的作品，大多显得意气风发，对于马华文艺的前途具有无限的信心。

也许，一般作品的「差不多」倾向的形成，和新的一批作者的刚刚崛起不无关系。因为，新的作者，大多是比较年轻，生活的经验欠丰富，阅读的范围不够广，观摩的作品不够多，因而一时还不善于从各个角度来描写现实，用各种方法来表现主题。

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我想，多多体验生活、扩大阅读范围，包括中国三十年代的作品以及近代世界各国的名著，倒不失为克服「差不多」倾向的一个办法。

（一九七七年圣诞节）

附 记

这篇短文是去年年底写好的，因为学会的同学说是赶着要用。但终于不见有人来拿去。所以一直丢在抽屉里面。现在搜寻出来，已经是「文创」成绩揭晓以后的事了。我看过报章新闻版上文创比赛的得奖名表，觉得和我原先推测者有点距离。有的

篇什，我预料它可以得个优胜奖，结果似乎没有。
也许这倒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评分，有时可能是主观的、片面的，不如多数人的平均分数的客观与全面。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四日）



读「翻书偶记」

黎力「林涛声里」的「翻书偶记」，有一段文字在奇怪香港一家出版社，怎么那样没有常识，光明正大地出丛书，却不志明出版日期。如黄蒙田的「山水人物集」和阮朗的「泥海泛滥」，就都有这么一个「特色」。

作者所指的这一家出版社，我想就是万叶出版社。它所出版的丛书，叫做「南斗丛书」。属于这套不志明出版日期的丛书的文集，除了上述的黄蒙田和阮朗的两种之外，据我所见到的，还有陶融的「书与桥」、萧铜的「马路集」、夏果的「石鱼集」、柳岸的「海隅杂记」、叶灵凤的「故事的花束」等几种。

黎力先生说：「一本书出版了，总得在书内列明著作者、出版社、和出版日期之类，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知所选择。认真一点的作者，除了正文之外，往往还在书中附上序言或后记，详细交代写作的年代、经历、感想、期望，以便帮助读者理解作者思想和作品的内容。尤其是翻译作品，书的前言或译后记，更是阅者阅读全书时必不可少的部份……。」

这话没有错。相信万叶出版社也很明白这个道理。该社丛书的不志明出版年月，应该不是「没有常识」，但也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是故意这么做的。

香港的一些出版社，多年来就有一种偷鸡主义的作风：出版一册文集，常常要将各文篇末原有的成稿或发表日期删去，必要时还做点其他的小手脚（譬如把「去年」、「前年」改为「一九××年」之类，）务使表面看来象是一册新写的书，不是许多旧文章的结集，从而给予读者一种「新鲜」的感觉，以便增加销路。有些出版家这样解释：「文章都是陈年的旧货，早已失去时间性，编印成书，又迁延了好些时日，内容更加发霉了，如果成稿或发表日期不去掉，还有什么读者要买呢？」近年万叶出版社的「南斗丛书」，故意不志明出版日期，正是这种偷鸡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大概该社以为，书籍连出版日期也没有了，那就等于永远是新书；读者不知道书的出版年月，则任何时候看来都有着「崭新」的感觉；这样，书的销路就不会受到「时间性」的影响了。

其实，书籍和报刊，作用并不相同。报刊的文章，时间性较受重视；书籍方面，读者倒是比较要求内容的坚实的。鲁迅的杂文集就是一个例证。那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作品，「时间性」似乎老早失去了，然而读者却是愈来愈多。

偷鸡主义者要以删去文章的成稿或发表日期，甚至书籍的出版年月来保持出版物的「新鲜」，以冀增加一点销数，我看是会弄巧反拙的。就我个人的情形来说，我便比较少买这一类书籍。我对这类书籍并没有一种「新」的感觉，反而

觉得它们有点来历不明似的。

在本地，偷鸡主义的作风，一向来是表演艺术方面稍为沾染了一点，正规的出版界倒是少见的。但近年来似乎也偶尔看到一些。前些时，我自己就遇到一宗。

去年，一个团体主办一次文艺创作比赛，要我也当评判。分数单交去之后，又要我写点评语。于是我勉强挤出了几百字感想，题目叫做「评分后记」。写成的日期记得是去年的圣诞节，也同样在稿末注明。因为听说颁奖礼要在一月间举行，所以又加上一个「为颁奖礼作」之类的副题。然而一直不见有人来取去。我以为是不需要了，也就随便丢在抽屉里。到了今年四月中，忽然又有电话来要稿，说是准备送去打字，赶排特辑。当时，创作比赛的成绩已经发表，我把稿子从抽屉里搜寻出来一看，觉得内容似已过时，便在后面加了一段「附记」，说明那是去年评分以后，成绩尚未揭晓的时候写的；也提及我看过报章新闻版上创作比赛的优胜名表后，觉得和我原先预测者有一点距离。

过了一段时日，听说特辑出版了。又过了两个星期左右，我收到两册赠书。翻开来看，文章确是登了出来。然而题目「评分后记」，篇末的成稿日期，以及后来加上去的「附记」，却是通通不见了。

为什么又催着要稿，又要这么除头去尾来发表呢？我想，删去题目，大概是为了编排上的整齐划一，因为特辑的编者把好几篇文章合排在一起，标了一个总题。至于去掉稿末的日期和「附记」，那就似乎和上述的一些香港出版社出版书

籍时故意不志明出版年月或删除书稿写作日期的做法相仿，
为了免使文章显得太旧，也就是有点偷鸡主义作风。也许有
人认为这也是没有什么的，但我以为就编辑书刊的工作来说，
总是一种不大踏实的表现。

（一九七八，八，卅一。）



剧 人

近时把历年来搜集到的一批关于戏剧演出的资料清理了一下，希望有机会时编辑一册战后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星马话剧活动的史料，以便为我自己在整理这方面史料的工作上办一个结束。结果，发现战后初期的资料保存得最少，只有寥寥数篇。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这一段，则以有关中正戏剧会者比较可观。而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十余年间，有关文章却是特别丰富，比较前十年的总和多了好几倍，几乎每个团体的活动都有一些。其中以艺术剧场的份量最多，其次是南大戏剧会及南大剧团，华中校友会及戏剧会，中正戏剧会，艺联剧团，康乐音乐会，人民行动党文化局，新加坡人民协会，电影戏剧研究社，表演艺术学院，儿童及青年剧社，丽的呼声，吉隆坡剧艺研会……等。

但在战后初期的仅有的少数资料中，却也有一篇是相当难得的。那就是林晨先生写的「实验剧团旅檳公演纪实」，登在一九四六年中本地报章的新闻版上。文中叙述当时新加坡实验剧团在檳城演出，观众寥落，好多个晚上都是四座稀

疏，但该团仍然坚持演出，全体十七个青年男女，每晚卖力演戏，弄得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身心疲惫，有的甚至抱病登台。有一晚，演「狂欢之夜」，台下观众不满三十个，导演照旧咬着牙根敲锣启幕。他们说：「台下就是一个看客，我们也是要演的。」

文章又描写一个叫做老刘的团员，善演「雷雨」中的鲁大海，工作特别起劲。有次，人家劝他：「老刘，算了吧！……你别忘记你家里的小刘，将来她长大了一定会怨恨你，怨恨你搞戏剧，使她幼年时代得不到一般应有的享受。」但老刘立刻回答：「小刘？不会的。我将来还要使她成为一个成功的女演员。我已经发现她脸上筋肉的伸缩性很强。她的口虽然那么小，但哭起来却是非常大。这正是一个演员脸部表情的好条件。」

前辈剧人这种献身艺术的精神，实在感人，重读之余，我信笔写下了四句歪诗：

剧人渡海传薪来，
四座萧疏锣亦催。
冷炙残羹终不悔，
犹教儿女学登台。

但也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实验剧团在槟演出观众稀少的原因，倒也不是因为那时候槟城的一般人士不懂得欣赏话剧。槟城的话剧活动在战前已很蓬勃，没有理由到了战后初期反而倒退了的。据一位熟悉剧坛掌故的朋友告诉我，该团当时巡回演出失败，主要是由于在槟城的卖票工作搞得不好，引

起一些社团的误会，因而有点受到杯葛的缘故。

（一九七八，九，八）



文艺活动述略

(一)

今年的关于文艺活动的报导，早就不打算写了，看看一年将残，便把开年以来积存的一批报刊捆成几大包废纸，准备束之高阁，让书架腾出一点空位来容纳新的出版物。没想到编辑先生却来索稿，说还是要这么一篇流水账式的东西，而且「字数不论」。这么一来，又非拼凑几段文字，聊以塞责不可了。于是又把那几包准备弃置的报刊打开来，清理一番。然而墙壁上的一叠日历已经撕剩了最后两三天，无论如何是赶不及新年应景的了。

为了方便，还是从刊物和新书谈起吧。

刊物方面，今年倒有好几种新的杂志或副刊出现。我所见到的有下列四种，都集中于新加坡：

一 「新苗」月刊——二月创刊，至本年底约出九期。这是一份少年学生的读物，属于一般性的文艺部份的只是一个杂文专栏“抵掌而谈”和一些转载的作品。

三 「绿洲」双月刊——五月创刊，星大中文学会出版，已出三期。内容为综合性质，包括国际时事、社会经济、思想修养……各类文章，文艺作品祇是其中的一部份。但因为该刊是个每期一百页左右的大型杂志，所以这一部份所占的篇幅也不太单薄。

三 「写作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员园地，每两星期借南洋商报的版位出版一次，每期一版，六月二日创刊，已出十余期。该会另一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则改为半年刊杂志「文学」，已出两期。

四 「拾穗」双月刊——山图书公司出版，十月创刊，稿件以书评为主。这是我所见到的星马地区的第一个书评杂志，（五十年代初期世界书局有「出版消息」的编印，但没有公开销售，）内容不逊于六十年代日本出版的「大安」、「书报」、以及最近香港出版的「天地丛书」等同类刊物。

另有三几种文艺集刊或篇幅较多的戏剧演出特刊，如「不是浮萍」（征埃等著）、「鼓阵」（鼓手文艺之二，吉隆坡出版），「生活剧社文艺晚会特刊」……等，或者也可以视为各出一期的新杂志。

原有的各种文艺或综合性刊物，如「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月刊」、「新加坡青年」、「民众报」、「奋斗报」、「楼」、「红树林」、「北斗文艺」……以及各报的副刊如「晨星」、「文艺春秋」、「新年代」、「读者文艺」、「青园」（八、九月止）、「星艺」……等，则仍继续出版。

新书方面，光景仍与过去三两年相仿，星马两地合共约

为七十种左右，其中以散文居多，小说诗歌次之。下录是我个人所知道的书目，不够完整与准确。

小说——捞起（于沫我），幻灭的黄昏（方北方），瓷象（伏浪），姐妹情深（怀鹰），楼上和楼下（岳典），讨海人家（马华短篇小说选，李拾荒编），雨在门外（周粲），窗外那云（周粲），山鹰（梦平），零（宁丹），她们的小说（文戈，凝秀等著，马汉编），当红灯亮起时（黄华），光辉的生命（姜凌），初见彩虹（蓉子），暮色中（菊凡），出路（李阵风）。

诗集——写在船厂的诗（李擒白），金山顶上迎朝阳（垂仰），山花集（马德），赤道放歌（田思），花柏山（苗芒），心境的展示（黄应良），当一颗心在跳（萧艾），一片慈爱（草风），内外集（王润华）。

散文——临风集（徐帆），老树昏鸦（庄敬），春泥集（纪铮），冷眼集（伍良之），在医学的道路上（李松），记者生涯三十年（韩觉夫），迎春夜话（周颖南），抛砖集（林一飞），爱的圈圈（君盈绿），社会鳞爪（谭幼今），琐屑集（张挥），闲想集（李建），只因为那阳光（周粲），满天的风筝（周粲），飘飘夜雪报冬寒（陈华淑），坎坷集（赵心），艾骊散文集（艾骊），今是楼杂笔（翁翼），奔驰以外（江上舟），游踪二集（骆明），云的随想（郭四海），音乐雨（辛白），火（杜诚），六城记（连亮思），心霞集（蔡欣），雅波专栏（雅波），长廊（廖青），少年寄简（王振青），小休录（方修），纽澳菲见闻录（黄寒

秋)，山温水暖（长缨），当祖母年轻的时候（李建）。

评论、研究——春温集（崔崢等），音乐、舞蹈、戏剧（许永顺），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王润华），春秋史考辨（郑良树），文史论丛（李建），苏东坡（邱新民），诗人杜甫（邱新民）。

总集——园丘杂笔（劳文青），风雨、黑夜、树（李劲），黎渭奎选集（林清隆编），望尘集（艾云），全国文艺创作暨工友征文比赛佳作特辑（奋斗报编），不屈的人们（星大中文学会主办创作比赛佳作特辑），铜象的故事（奔浪），半掌集（人间），关新艺演余集（关新艺），风过处（水祥云等），唤不回春天（华义中学），童年（华义中学）。

其他有关读物——语文与教学（卢绍昌等），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吴元华），星马史论丛（崔贵强），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崔贵强、古鸿廷），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方修），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林肇刚·油印），语言散论（潘文光），风云人物续篇（郑辉），成语故事（郭清改写，李成业英译），林锡忠速写集（林锡忠），名医黎伯概先生诗文集（许云樵辑校），教育学报（新加坡教育学院），南大问题评论集（傅孙中编）。

今年似乎没有戏剧集出版，但华文作品翻译为其他语文的出版物或书稿却有增加，已知者有「现代马华诗歌选集」（译为马来文），「马华新文学史稿」（方修著，麦唐纳博士、生田博士合作英译），「再见蕙兰的时候」（黄孟文著，

自译为英文，获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翻译奖金。）

(二)

举办创作比赛、书刊展览、奖励作品出版等，仍为本年文艺活动的热门项目，而且有更多的机构参与推动。新加坡方面，热闹的场面尤多了一些——

一，南大中文系与该校中文学会，一月八日至十日假国家图书馆举办「星马文学书刊展览」，展出诗集一百二十种、散文集约一百卅种，小说二百五十余种，剧本三十余种，总集、游记二十五种，杂志数十种。

二，南大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一月廿六日假南大文学院讲堂主办「全国诗人新诗朗诵大会」，参加的诗人共二十九名。

三，全国职总奋斗报主办「全国文艺创作暨工友征文比赛」，继去年底成绩揭晓后，今年一月廿八日举行颁奖礼，并出版佳作特辑。

四，星大中文学会主办「一九七七年度星马文艺创作比赛」，于今年四月初揭晓，五月一日假星大学生楼举行颁奖，并举办文艺座谈会，出版入选佳作特辑「不屈的人们」。

五，石叻道联络所青年团为庆祝成立五周年，本年初宣布举办文学创作比赛，四月截稿，五月揭晓，并先后主办「文艺活动周」及「文学青年营」。

六，星洲日报于三月间广泛征求小说佳作，成绩七月底公布，文艺小说得奖作品三篇：「路」（梅筠）、「浮云终

日行」(东晞)、「忘忧草」(中山荻),先后在该报连载。

七,南大中文学会五月间举办征文比赛,题目「我与文学」,七月中截稿,优胜作品八月起在南洋周刊发表。

八,南大诗社于八月五日及六日假中华总商会举行「诗展」,分为三组:(一)诗艺组,展出诗与其他艺术媒介结合的作品约五十幅;(二)诗乐组,以新加坡诗人诗作入乐演唱,共九首;(三)诗集展,展出新加坡独立后出版的华文诗集。

九,新加坡文化部主办剧本创作比赛,成绩八月初揭晓,华文组共有七十七部作品参加,结果多幕剧组及独幕剧组各录取优胜奖三名,安慰奖五名。颁奖礼于十月十二日假国家图书馆讲堂举行,由国会议员何家良主持。

十,人民协会民众报八月间宣布主办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由华联银行赞助,奖金丰厚(首奖一千元加来回马尼拉飞机票一张),顾问团阵容盛大,包括两名政府内阁成员(李炯才部长与欧进福博士)、两间大学中文系主任、四家华文报总编辑……。

马来西亚方面,这一类活动大都是由一些会馆、商会、校友会在努力——

一,大马福建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联合主办「文学出版基金征文赛」,第一届于今年初揭晓,共有五部学术及文艺著作获颁奖金资助出版。第二届则于今年八月开始征稿,十月卅一日截稿,据悉已评审完毕,成绩可在明年初公布。

该基金评选委员会主席郭洙镇律师于本年初发表谈话，认为文艺界必须先有一批具有伟大善良的精神世界的作者，才能出现伟大的作品；而伟大的背后，就是伟大的牺牲与献身精神。又说，马华文艺作品有两种倾向，第一种是注重内容的坚实，第二种是注重形式的美，「坚实的内容是文学的根本，不过它也要通过美好的形式才能充份的发挥出来」。

二，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去年设立文学奖及新闻专题写作奖，团体及个人参加者颇为热烈。本年七月公布评审团的决定，作品水准不十分理想，若干个人奖及文学斗士奖暂予悬缺。

三，檳城南大校友会六月初起举办「全国华文文艺创作比赛」，分为公开组及学生组，九月截稿，成绩料已揭晓。

四，新山中华公会教育组，主办「王万才诗文奖」，七月一日开始征稿，九月卅日截稿，敦请星马文教界人士组织评审团审阅稿件。

(三)

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的筹组，去年曾引起一系列的论争，今年续有发展。

七月廿八日，该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前夕，有一群作者突然在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正通过律师向高庭申请禁令，宣布该成立大会为无效，因为大会的召开不合程序。这一群作者，「包括报章总编辑、杂志主编、副刊主编、大马文坛作家、报章记者及编辑」，据称皆遭大马作协筹委会拒

绝批准为会员。他们的发言人梁纪元告诉记者说：“大马华文作协是一个代表全马华文作者的团体，因此门户应开放予全马华文写作者，那些不欲成为会员者自当别论，但我们却是诚意欲加入这个团体，以共同推动大马华文文坛的工作。……相信遭作协拒绝入会者也包括其他州的写作者。这显示出所谓大马华文作协已沦为一小撮集团所控制的组织，而他们却声称代表全马华文写作者，这是令人感到极为痛心的事”。（新加坡星洲日报「马来西亚新闻」）

如果说，去年的风波，有一部份还是属于「应否筹组大马作协」问题的不同见解人士之间的论争，那么，这一次，倒完全是同属支持成立作协的热衷者之间的内讧了。

第二天，作协举行成立大会及选举第一届理事，场面更加紧张。据报载，那天有逾百名写作人出席大会，两人要求列席被拒。在成立大会过后进行选举理事时，大会在「缺席会员是否有被选权以及提名竞选」的问题上意见纷纭，争辩剧烈，浪费了长久时间。后来，问题解决，提名开始，又出现了争先恐后的混乱局面。举手的，站立的，手持麦克风的，都同声对主席说：「我提议……………」竞选理事的人数原定四十名，经过约莫半小时的热烈提名附议后，上榜的已达三十九名。由于数位提名者都坚持自己先向主席要求提名，因而又再次引起争执。最后，好不容易才选出二十五名理事，并发表成立大会宣言，呼吁所有写作人认清所负的时代使命，捐弃派系成见，争取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团结一致，朝向提倡健康文艺，打倒黄色文艺的庄严目标奋进。宣言同时

表示将通过筹募基金或其他合法途径，促进文学理论研究，提高大马华文文学水准，与其他语文源流写作人交换写作技巧和经验。

(四)

戏剧演出，今年显得频密了些。新加坡艺术剧场先后献演两次，其他团体如艺联剧团、生活剧社等也都做出成绩来；联邦戏剧界的活动似乎也有增加，除了吉隆坡的戏剧节之外，檳城怡保马六甲各地，均有较有份量的戏上演；兹综合报导如下——

家长的隐忧（两场话剧）——檳城夜莺文娱社银禧纪念演出。（一月初）

学成归去（独幕剧），高山上的青松（诗歌造型）——吉隆坡巴生路青年会文娱晚会演出。（一月初）

两个梦（秘书梦、惊梦）——新加坡艺术剧场。（二月十七——十九日；廿五、廿六日）

救救孩子（独幕剧），擦鞋童（哑剧）——万津中华校友会文娱晚会。（三月）

来莺儿（古装剧）——新加坡人协文工团巡回演出。（三月卅一日）

嫁（三幕四场喜剧）——新加坡银行雇员联合会东京银行分会华语戏剧研究会庆祝周年纪念演出。（四月十五、十六日）

月光曲（歌剧）——怡保清韵合唱团廿周年团庆。（五

月卅日)

阿Q(哑剧)——新加坡实践艺术学院学习汇报。(六月四日——十一日)

钱(讽刺剧), 今事古谈——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青年部华乐队在巴生演出。(六月三日)

一切都明白了、傻伙计(短剧)——丁州华校游艺晚会演出。(六月十六日)

小青(三幕歌剧)、影艺怪谈(快板)——马六甲培风校友会文娱晚会演出。

春风路柳——吉隆坡戏剧节演出。(六月廿三——廿五日)

误会——吉隆坡戏剧节演出。(六月卅日——七月二日)

风雨故人来——同上。(七月)

萤——艺联剧团参加新加坡国庆戏剧节演出。(八月八日)

家庭教育(短剧)、理发记(谐剧)——森州万茂青团分会庆祝二周年纪念。(九月)

赌(五场话剧)——新加坡艺术剧场。(十月十一——十五日)

都市人、老板娘的故事——生活剧社。(十二月十八、廿六——卅日)

上录剧目, 以新加坡艺术剧场的「赌」获得的评价较高。剧评者认为, 「赌」的演出, 对于艺术剧场来说, 有了相当突出的突破: 一, 扭转了过去较象戏的倾向, 比较能够

重视生活，比较典型地突出人物形象；二，演员们比较能够深入故事，舞台上的活动比较有机地产生联系作用；三，高潮处理显得自然有力，群众场面顺理成章地出现，给人以较大的鼓舞力量。（纪创：「艺术剧场演出『赌』观后感」，生活剧社文艺晚会特刊）

以表演艺术为主的演出，个人所知者也有下列多场——
「管弦齐鸣」音乐晚会——新加坡人协华乐团。（三月十、十一日）

第二届全马华乐比赛——吡叻留学台湾同学会主办。（四月二日）

华人文化汇演——马六甲马华公会主办。（四月杪）

五月歌声——新加坡文化部主持「大众音乐」邀约佳音合唱团演唱。（五月六日）

乐府新韵——星市音乐会。（五月十一日）

文娱观摩晚会——诗巫文娱团体联合演出。（五月杪）

文艺晚会——士姑来青年会庆祝十六周年纪念。（六月四日）

华乐观摩会——新加坡国家剧场华乐团。（六月十二日）

「青春的旋律」音乐晚会——新加坡国家剧场俱乐部合唱团呈献。（六月）

文娱晚会——新加坡武装部队后备军人协会庆祝成立六周年。（七月八日）

音乐晚会——新加坡公教中学校友会。（七月廿五日）

电台音乐会——新加坡广播电台华乐团演奏。（七月廿九、卅日）

「让我们放声歌唱」文娱晚会——昔华中学校友会主办。（七月卅日）

全麻舞蹈比赛——麻坡永春会馆青年团主办。（八月十二日）

「青春之夜」音乐会——新加坡教育部青年音乐协会属下青声合唱团演唱。（八月廿六日）

芭蕾舞之夜——新加坡芭蕾舞学院献演。（八月）

新加坡全国舞蹈节——人民协会主办。（八月廿九——卅一日）

音乐晚会——新加坡中艺民族乐团。（九月一日——四日）

鸣放舞蹈欣赏舞会——马六甲马华公会主办。（九月廿七——廿九日）

电台音乐会——新加坡广播电台华文节目组主办。（十月卅一日）

文艺晚会——星洲日报联合中艺民族乐团及艺术剧场，为裕廊油槽船爆炸惨祸罹难工友义演。（十一月十五、十六日）

文艺晚会——南方艺术研究会为油槽船爆炸事件罹难工友家属筹款。（十一月）

春天大合唱——星市音乐会。（十一月廿六、廿七日）

音乐晚会——槟城音艺合唱团庆祝成立十三周年。

吉隆坡歌乐节——雪州华人体育会合唱团、人镜剧社合唱团、茶阳励志社合唱团、惠州会馆合唱团、芙蓉中华校友会合唱团、琼联剧社合唱团、勇进口琴社、南益校友会华乐团、怡保清韵合唱团等参加演唱。（十二月六——八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卅日稿



文艺活动餘谈

(一)

替报章副刊赶写了一篇「文艺活动述略」之后，觉得还有些少剩餘的资料可以抄抄写写。

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在筹组期间以至举行成立大会之日，一直吵吵闹闹，歧见多多，然而成立大会的宣言，却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献；因为开头的第二三段文字，对于马华文学的历史，有颇为扼要而正确的论述。

宣言说：「在约六十年的时间里，马华写作人在传播知识、发扬文化、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以及敢于反抗不合理的旧制度、勇于批判不正确思想的共同精神感召下，虽处于散漫的状态中，亦分头努力创作，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为马华文化、乃至国家文化，留下宝贵的资产，丰富了子子孙孙的精神生活，更成了推进社会的时代号手。」

宣言也指出，马华写作人在不同的时期，都能站稳立场，对本地区人民的生活、思想、乡土风貌、社会进展作出各种

不同角度的反映，并在抗日战争、反殖民地主义的独立运动时期，向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作不屈不挠的反抗。在增进各兄弟民族间的了解和睦与合作方面，马华写作人也本着良知与正义的信念，鼓吹不遗余力。而对于腐蚀人心的黄色文化，更不犹疑地给予无情打击。这是马华文学优良的传统。

如果这不是宣言的执笔者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该会的许多会员的态度，那倒是非常难得的。

在我的印象中，现在成为该会会员或职员的好些作者，前些时候对于马华文学的看法都不是这样。其中有的强调马华文学就是现代诗，除了现代诗之外没有马华文学；有的坚持出书数量的多寡即等于马华文学的盛衰，书出多了就是马华文学蓬勃了；有些朋友则在怀疑马华文学其实并没有主流，真正的主流是殖民地主义势力；……这些观点，拿来和这一次的宣言的内容对照，后者无疑是跨进了一大步，这是可喜可贺的。希望该会会员能够以这宣言为共同努力的基础，真正继承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为马华文学作出巨大的贡献。

(二)

新加坡书籍节于八月廿八日揭幕，在这前后报章上出现了一些书业的有关人士的访谈新闻，谈论本地华文文艺书籍的前途，有者表示乐观，有者认为前景不佳，有一两位特别提到诗集，宣称「没有销路」、「毫无出路」。

上海书局董事经理陈蒙鹤说：「上海书局过去也曾为本地作者出版过文艺书籍，多以小说为主；这几年所以没有再

出版，主要是许多人交来的作品都是诗歌和评论文学，而这些体裁在本地都是没有销路的。」

这里还有一项「评论文学」作为陪衬，新民中学教师刘瑜就说得更加直截；她说，诗集已经毫无出路了，她曾替朋友推销过诗集，非常困难。（八月廿六日南洋商报新闻）

文艺书刊销路的好坏，与文学运动的升沉隆替有关。现阶段书籍的滞销，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但出版商和推销人对于诗集的唉声叹气，却是比较新的现象。

在中国，郭沫若的「女神」曾经风靡一时，艾青、田间、臧克家等人的诗集大多是畅销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星马地区，战前没有诗集出版，但报刊上的诗歌却是一般读者最先选读的作品。战后，诗集陆续出来了；然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中期，我们都还很少听到「诗集毫无出路」的怨诉。相反的，有好些集子，如米军的「热带诗抄」，却还成为读书界经常搜求的对象。所谓「毫无出路」，似乎只是近年来才流行的话题。

何以目前大家对于诗集特别表示缺乏信心呢？是诗人太多了？还是诗歌产品太滥？是读书界愈来愈庸俗、不爱读诗、不懂欣赏诗？还是诗人们愈来愈孤芳自赏，脱离生活，脱离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以致作品不受读者欢迎？抑或是另有什么更为复杂的原因？还是书业界对于诗集的悲观论调其实祇是片面的看法？

这倒是值得思索的一个问题。

(三)

不过，诗的确也是一种难写、或者易于使人迷失的文学样式。手头的几张报章副刊，刚好有一篇题为「我怎样走出象牙塔——从沉沦到觉醒」的文章，作者歌伐，自述他写诗的痛苦历程，内容颇为生动，任其淹没在旧纸堆中未免可惜，这里略作介绍，以供大家参考。

作者说，他很小就辍学，初涉文艺，始于新诗，从他就读中学的表哥所订阅的一份X报接触到新诗作品。当时经常听他表哥介绍学校老师对于新诗的奥妙与晦涩所作的解释：妙就妙在莫名其妙，可懂得就不算奥妙，于是不知不觉之中被导向文学游戏的领域里。他花费非常多的精神和时间去解剖这类犹如耍魔术的文体，常常被它们的晦涩与戏耍的态度所迷惑，然而却又逞强地欣赏下去。玩味久了，自然也兴起涂抹的冲动，于是写下了——

燥 贯穿世纪

焦干了树 叶

遂歌断

一地荒凉

羽化一切 在

你我之间

于 短暂风程

.....

由于不满现实与自己的处境，便时常求取精神的解脱，

不自觉地意识再往下沉堕，遁入力求「超越」的路向去。思想离开了现实，自以为才质高人一等，鄙视常人的举止，认定文学是超俗的。于是再写下——

.....

风呵 沐我以逸

云呵 聚我以灵

.....

我心是冰之清

我毅是山之恒.....

作者写道：「同时期，唯美形式创作以叛逆姿态勃起，一些论、作者也喊出了文学不可媚俗，不能迁就读者的口号，对于我这个『知音』，是感到兴奋的，更令我的思想趋向狂妄，续往象牙塔尖上爬。

「对文学发生好感，阅读范围也跟着增广，也看到有人批判这类诗和创作态度。作为支持者，当然厌恶敌对批判，找理论辩护和抗御，甚至认同了余光中的『诗人与驴』论，加强了好诗非凡人可解的概念。」

作者后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批性格豪迈、热情明理的干粗活儿的朋友的启发与帮助而渐渐觉醒，他写出他对于诗歌创作的初步体会：文艺「应为人群」，不是「为私」；「必须以踏实的思想和明朗的手法表达主题」；「最重要的是自我批判，只有自我批判才不致迷惑了本性。」（三月六日「文艺春秋」）

(四)

检讨近年来本地的理论批评，批判所谓「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也是今年文艺界较可注意的一件事。

「文艺春秋」十月八日发表了俚言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仿效「三突出」的塑造方法，本地舞台前此出现一些正面人物，一出场就是响当当的有远见的英雄，令人觉得高攀不上，而且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的人物演得多了，不但普通观众表示厌烦，连同行中人也不忍卒睹了。对于外来的思潮，应该结合本地现实情况来分析取舍，因时因地制宜。文艺工作者最少必须是深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人物，应该在学习与工作中培养正确的生活目标，才能戒骄戒躁，少犯错误，勇于接受新生的事物，也勇于抵住邪恶的潮流。

作者又有一段话说：「我们对待相反的意见，有时却也缺乏耐心和理智，尤其涉及权威性的看法时，大家便象受到侵犯一样，或者不屑与之讨论，或者群起而攻之。譬如由『批判现实主义尚有发展的余地』一说所引起的争论里，就有上述的现象发生。」（「关于文艺批评」）

十二月间出版的生活剧社文艺晚会演出特刊，更有一篇论文专谈「三突出」的问题。作者指出：「三突出」是根本错误的，但是有不少人批判「三突出」，却是批错了的。这些人以为批判「三突出」，就是不写劳动者，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劳动者还是要写的，而且主要的还是要写劳动者。但是，决不是依照「三突出」所宣传的那种形而上学的创作

方法去写，而是从劳动者的真实生活中去发现生动感人的创作素材，去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去创作既能真实反映生活，又富有艺术感染力和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当然，结合本地的社会实况，还要写白领阶级、知识份子、中上层社会，或者流氓、舞女、娼妓……等等。怎样去写这些人物，才是问题的关键。是认真地、确实地从这些人的生活中去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去发现素材、去塑造形象，然后才创造出真实生动的文艺作品；还是凭空想象、瞎子摸象式地附声绘影，遵照几条死框框，照搬生硬的、僵死的教条理论、公式化的社会关系描写等：这就决定于文艺作者是否认真地、彻底地批判了「三突出」的唯心毒素，是否只要治好咳嗽而留下肺癆。（「三突出有没有错？」）

一九七八年除夕稿

新春试笔谈批评

(一)

说是新春试笔，谈的仍是旧话题：批评。

关于文艺批评的谈论，去年确曾热闹了一阵子，大报上有访谈新闻，小报上有短评发表，副刊杂志更有不少专文讨论。前些天写文艺动态报导时，本来也想抄录几段文字下来，但临时却发觉好些有关的资料事前未及收存，一册听说刊登了一篇谈论批评问题的长文的文艺杂志则没有买到，（前数期蒙一位朋友相赠，没料到这一期偏偏走鸡，）手头仅剩下零零星星的几篇短文，材料不够全面，于是只得作罢了。

这两天想写所谓「新春试笔」，重新翻看这几篇短文，却又觉得其中一两篇有点读后感可以谈谈。

「文艺春秋」上面南徐先生的「长短篇」有几句话对我很有些启发性。他说：我们只要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凡是因批评而引起论争的那些被批评的作品，大都是一些内容

低劣、歪曲现实，艺术技巧平庸的东西，需要严肃鉴别和认真对待的（大意）。——这话的确使我思索了一下。马华文学史上一些因批评而引起的论争，不论战前还是战后的，有关文章我多数略为看过，但一向比较留意的祇是事件的起因、经过、是非、影响等等；至于这些论争的共同特点、规律之类，却是从来没有去想的。现在经南徐先生这么一提，自然地对六十年来的一系列文艺论争，就阅读的记忆所及，作了一番检视，结果发现南徐先生的论断，竟然有一半以上是对的。

马华文学史上许多因批评而引起的论争，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生于马华文学的高潮时期、或者低潮时期的某一较有生气的阶段或地区。这些论争中，被批评的作品，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铁抗的「试炼时代」），一般上确是内容低劣、技巧平庸，至少是存在着比较大的缺点，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如果那作品是属于议论性质的文章，则一般上是内容荒谬、有害读者，至少也是出现了若干舛误，需要补偏救弊的。

另一种情况是发生在低潮时期、或者虽属高潮期、但文风还未臻开展的阶段或地区。在这些论争中的被批评的作品，那就不一定是内容低劣、技巧平庸的创作，或观点荒谬、有害读者的论文；更多的情形是恰恰相反，倒是「批评者」小题大作，无理取闹，甚至于借题发挥，竭力中伤有关作者的。一九三三年静倩的「芳娘」、「绿林中」等戏剧被批评而引起的与郑文通的论争、一九三六年李润湖的「南国文坛报

屑」被批评而引起的与李紫凤的论争，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

当然，这里讲的祇是一般的现象，不是绝对的规律。要有更准确的论断，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二)

书评杂志「拾穗」双月刊的发刊词说：「好的书评对于喜爱读书朋友们是有用的。一本书，不论它是否可读，只要有一篇不是迎合和谄媚的书评，那么这本书便有一读的价值。」这也是一段颇能引人深思的话。

一般人对于书评的概念，大抵认为这种文章只是在推荐好书，揭发坏书，帮助读者节省选购读物的时间而已。至于将一本不一定可读的书变成「有一读的价值」的这一种功用，通常却是被忽略了。

其实，这种功用也同样是有助于读者买书看书，减轻读者负担的。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书，真正精彩的可说很少，大多数的读物是属于下列两类：一、有着一定局限的比较好的书；二、至多祇有些微参考价值的坏书。对于某一册第一类的书，如果有一篇「不是迎合和谄媚」的书评，适如其分地给予一个评价，老老实实在指出它的意义和缺点，或者某些章节是它的精华，某些部份是它的糟粕，这就等于替一般读者在如何看待这本书的问题上打了一个底，那么，他们本来不一定想读的，这时候也可能找来翻翻，读起来也觉得心安理得，开卷有益了。

不过，这种书评的功用，最少也要对于好坏参半的书才

会见效。如果是第二类的书——坏的部份多过好的部份，甚至于完全不好的书，则这种功用就不灵了。因为目前大家可以买到的比较好的书还颇不少，除了少数进行某些专门研究的人士之外，一般读者实在犯不着也不可能花太多有用的精神和时间去读那些坏书。「不是迎合和谄媚」的书评，写当然还是可以写，应该写的，也同样有其指导的作用与存在的必要，但要使到被批评的坏书变成了「有一读的价值」，那恐怕就很难了。

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削烂苹果」的办法。大意是说，一些有缺点的书，可用批评来补救，正如对于一颗有些烂了的苹果，把烂了的部份削掉，就可以吃了。（手头无书，容后订正）

这一段话可就说得非常精当。鲁迅指的应该就是我们上述的第一类的书——多少有些局限但是比较好的书，所以才有所谓部份的「削」。如果是大半已经糜烂，甚至完全烂掉了的苹果，那就只能送进果酱厂去大刀阔斧地「削」，或者送给种植者或专家去研究，或者完全扔掉给大家看，而不是介绍给普通的人去作得不偿失的品尝。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

一段回忆

在「文艺春秋」和「新加坡文艺」先后拜读了方北方先生的两篇「马华作家印象记」，觉得其中一段关于我的略历的记述，与事实稍有出入。这本来是没有什么的，算是传闻失实好了。然而北方先生的记载是把我的经历提升了一级，随习记者变成正式记者，外勤记者变成副刊编辑（旧时报馆编辑的待遇比外勤高），倘有熟悉报坛掌故的朋友，误以为是我供给资料，制造历史，抬高自己，那就恐怕闲话多多了。所以这里想作两点小小的补正：一、我在新国民日报做的是校对和随习记者，不是正式的外勤记者；二、我不是民声报的什么副刊编辑，祇在早期的该报当过五六个月的外勤，接着就转入中华晚报。

要把这两件琐事讲得清楚些，可能需要多费一点笔墨，不如索性写成一篇回忆录吧。

故事应该从一九四一年初讲起。那时，我大约是二十岁或多了一点，刚因华南一带战火的影响，辍学南来不久，由一个同乡介绍，在吉隆坡的一间商行学做生意。据说，这是

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因为生意来往的都是什么森那美、牙直利、然利直等等大洋行。但这种前途对我的吸引力不大，我始终喜欢看看一点文艺书籍以及报章杂志，或学习写一点短文寄到报刊去投稿。

大概是多看报刊的缘故吧，我有点向往于报馆的生活。但吉隆坡一向来报馆很少，而且规模小，职位不多。三十年代后期的好几年间，只有一家马华日报在惨淡经营，由于营业不振，一九四〇年停刊了。这时，虽有新国民日报代之而起，却也仍然是孤另另的一家，不象新加坡和檳城的办报风气那么蓬勃。所以，要论择业，这一行在当时的中马地区实在是一个窄门。

新国民日报原是三十年代新加坡「五大报」之一（其餘四家是星洲、星中、总汇、南洋），一九四〇年并入南洋报社。一九四一年一月起改在吉隆坡出版。该报在吉隆坡发刊之初，我偶然见到一则「主笔周寒梅走马上任」之类的新闻。我不知道所谓主笔，一般上是祇写社论，不搞行政，却以为既是「主」字出头，那一定是一间报馆的主管，负责聘用员工等等事宜，于是我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信去向他讨工做。不消说，那结果自然是被丢进字纸篓里去了。我得不到回音。料想是没有机会了，于是又照旧看我的书报杂志，写我的习作。

那年春节，商行照例放了几天假。除夕日，我搭了三等火车，从吉隆坡到G镇去探亲；随身带了一册洪丝丝主编的「现代周刊」在车上浏览。战前，我是檳城现代日报和现代

周刊的忠实读者；尤其是后者，我似乎是基本定户，每期必读的。

火车上，搭客稀疏。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中年人，个子不太高，但体格结实，皮肤白晰，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提着一个公事包，好象是个企业家的样子。也许是好奇，也许是旅途无聊，他竟和我搭讪起来。最初大概是问我是否喜欢读书写作，曾经在那儿投稿之类。后来他爽朗地自我介绍，说他叫做连天助，以前也爱舞文弄墨，现在进了商场，荒疏了。又说他也住在 G 埠，这两天是特地来吉隆坡看一些老朋友，刚刚和新国民日报的经理陈允洛吃过午饭，要回去了。

「新国民日报？」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写信去讨过工作的那间本地报馆么？于是我脱口问道：

「报馆是不是要用记者？或者排字工人？我想试试。」

我当时实在不晓得一间报馆除了记者和排字工人之外，还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做。我甚至不晓得排字工人的工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只是从书本上知道王云五是排字工人出身，后来发明了四角号码。所以心想当排字工人也不错，可以做发明家嘛！

连先生似乎不大明白我的思路，或者说，不大欣赏我的做发明家的幻想。他摇了摇头，想了一下，说道：「是这样，报馆是从新加坡搬来的，许多职员也就跟着从新加坡进来，或者老早就在新加坡安排好了。现在只有校对组的实力比较弱，陈经理托我替他在本地物色一位中文根底好些的校对。」

我看，你就做校对吧！」

「校对是做什么的？」书本上虽然常常出现「校对」这两个字，但我对它一向不求甚解。

「没有什么，对对稿件吧了，很容易的。——唔，这样吧，我在G埠的商会做秘书，春节后你去找我，我给你写介绍信，你见了陈经理，立刻可以上工了。」

过了两三天，我如约前往G埠商会，连先生正在忙着他的事务。他叫我在他的办公桌旁的一隻椅子上坐候片刻，并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印刷品，递给我，说是刚刚印好的，看看有没有印错的字，把它们划出来；接着，又埋头去办他的公事。我看了一下那张印刷品，原来是该商会的一份「告同胞书」，用文言写的，内容是呼吁大家响应什么捐款的号召，慷慨输将之类。我猜想是连先生的手笔，不禁怔住了，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回他明白我的想法了，于是加上一句解释：「是查错字，不是改文章，不要管文章写得好不好、通不通。」我以为他是要我借此消磨时间，等他得空了写介绍信，便草草地把那份告同胞书读了一遍，随手圈出两个错字。没想到他接过去一看之后，却高兴地说：「很好，很好。这里面有三个错字，你一下子就看出了两个，做校对包没有问题。」至此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出其不意的考试。

我持着他的介绍信，回到吉隆坡，见了陈允洛。陈经理着我隔天就到编辑部去向总编辑宋韵铮报到；并给我定了一个薪水，每月三十元。（相当于当时一般小学教师的起薪。）又说，这是报馆目前唯一的出缺，请我暂时「屈就」，多多

努力，将来有机会时再作调整。

从此，我开始了报馆的生活。

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连天助先生。这个和我素昧平生，祇因萍水相逢，在火车里作了一刻谈，就把我引进新闻界来的爽朗的人，不知道他现在何处？生活可好？我一直想念着他。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在报端见到一则吡叻州华文中学会考的新闻，附有一幅图片，旁边的说明是「监考连天助巡视考场」。虽然图片太小，人象模糊，我相信一定是他了。既然当监考，那就应该是吡叻州教育局的官员，要联络岂非十分容易？不料嗣后我到怡保出席星洲日报的记者会议，向几位专走教育新闻的同事探问了一下，回答却是：「吡叻州教育局的官员没有姓连的，当监考也不一定是教育局的人员。」这个答案太过出乎我的意想之外，我为之愕然良久，不怡终日。以后，就更加人海茫茫，得不到一丝关于连先生的消息。

从此，我也没有再见到陈允洛先生。因为当时报馆的编辑部是在市郊，距离市区的经理部好几英哩，非有必要，我们都不会下坡去打扰他。战后，陈先生改任新加坡南洋商报副经理，有几位已经到了新加坡的旧同事，鉴于吉隆坡沦陷的时候，新国民日报没有发过一分钱遣散费，曾为此事到南洋商报找过陈先生，要求设法给予一点补偿。结果听说每人得到三几百元的津贴。三百块钱，那时候的使用价值可不小，相当于目前的一宗低价股了。但我当时正在此间浪荡，破帽遮颜，不想去见他。又想到我祇见过他一次，他未必还记得

我。而且我是新国民日报在吉隆坡雇用的人员，南洋报社是否要承认，也是一个问题，于是我放弃了这个补发津贴的要求。后来，我进星洲日报工作，有一个时候正在想不好意思去看他，却又在不久之后，听说他退休了。因而，我在战后始终没有机会一瞻他的丰仪。直到最近，才在报章上看到陈先生庆祝九秩大寿的新闻和照片。这已经是他读了连天助的介绍信，安排我到新国民日报的编辑部去上工之后将近四十年的事了。

到了新国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之后，我发觉到我的确是该报在吉隆坡当地增聘的极少数的雇员之一。当时，报馆的经理、编辑、生产各部门的员工，就地取材者实在为数不多，即使校对和排字工人，也有相当部份是从新加坡调派去的。外勤记者如陆康贤、王悦民……等，虽然不乏吉隆坡的「老土地」，但也似乎是南洋报社原先的通讯员。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报馆内愈是高级的职员，愈是非属吉隆坡本地人。以经编两部为例，经理陈允洛、秘书戴益美、总编辑宋韵铮、电讯翻译王式民、本坡新闻编辑吴广川、本坡新闻翻译兼「文艺」周刊编辑李蕴朗等，都是当时新加坡的名报人。电讯组有两个新的翻译——彭友真和霍刚彦，则是来自檳城。（彭是由现代日报的外勤组转来；霍的出处不详，但对翻译亦已颇有经验，战后任南洋商报北马区办事处经理。）再就广告部和印刷部来说，两位主任林叔鹤和黄权和，在新加坡的新闻业中也都是有名于时的。（林战后在新加坡经营米郊，黄创设光华印务公司，均长袖善舞。）还有字房主任廖金泉

(?)，更是那时期新加坡数一数二的熟练的拼版高手；提起他的别号「希特拉」(因其面貌酷似希魔)，此间老一辈的印刷业人士，迄今仍耳熟能详。现在想来，当时新国民日报的易地出版，似乎不只是普通的搬家的安排而已，乃是一种挑选精锐、全力进击的姿态，意图在中马的报坛建立霸业的。

但连天助先生所谓做校对「很容易」的话，我却发现是说错了的。其时编辑部的一些重要编译，如宋韵铮、王式民、吴广川等，各人都有一套「十七帖」，要摸过一段颇长的时日，才能觉得习惯。特别是宋韵铮译的电讯，简直就象鬼画符。「日人」、「国人」、「四人」，写来一模一样，还算浅近易看的。所以，校对人员如非有点语文基础和国际时事常识，实在也穷于应付。

不过，宋韵铮的鬼画符虽然给我吃了一些小苦头，其为人倒是相当的平易。不久，他就发给我一份随习记者证，说我可以学习探访，写些时间性不强的新闻。这份随习记者证，后来在逃难中遇到英国兵盘问的时候似乎有点用处，但却在沦陷初期连同一册贴稿簿和若干其他文件，被一个「朋友」偷偷地付之一炬。那时我和他同在马真街附近一间麻雀馆避难，他乘我外出时擅自搜检我的破皮筐，见到什么文件簿册之类，就取出毁去，却始终不声不响。直到有一天我发觉不见了东西，他才大大地教训我一顿：「日本天你还收存这些东西，你不怕杀头，可别连累别人呀！」

现在我已忘了初进报馆的那一年间，究竟「见习」了些

什么？撰写过几则新闻？但有两件和「记者」不相干的事却还记得相当清楚。第一件是一个姓林的副刊编辑，不知何故，有个时期常常没有来报馆，发了稿就吩咐我代他看大版。因此我也就常常有机会较详细地来阅读这个副刊上面的一些作品。这是一个文艺性副刊，叫做「堡垒」(?)，每日半版，取稿水平不高，不大受人重视，不过其中有三两个作者，却也在战后成了名家，沙风先生就是脱颖而出的一位。

第二件是：那一年，吉隆坡政府当局实施新闻检查制度，编辑部大约在夜间三时半结束工作，一面准备印报，一面打大版派人专车送到新闻检查处去，并留下一个人在报馆等待检查官的电话。五时左右，电话来了，有时是O.K，有时是禁止刊出某一则新闻（或某一篇副刊文章）。O.K自然是再好也没有；如果是禁刊的指示，可就十分麻烦了。首先，要通知机房停止印报，然后是抽版、改版、或者「开天窗」。其次，已经印好的一部份报纸，则要发动一些印刷部的同事，逐份用墨笔涂掉那一则违碍的新闻。好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多，每月仿佛是一两次而已。我当时就经常被分配留在编辑部，做这种听电话、抽版、改版、涂黑墨的杂务。所以，我在新国民日报的职位，说是校对，随习记者，或编辑部的守夜、打杂都可以，但决不是正式的外勤记者。

这一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由北马入侵、直逼吉隆坡。于是报纸准备停刊，员工先后逃难；王式民、李蕴朗、彭友真、霍刚彦、我，以及原先由新加坡派去的一个校对主任（丁史浪）都逃到新加坡来。吉隆坡沦陷后，新

国民日报的设备为日军占有，搬去出版兴亚日报。宋韵铎、戴益美，以及一些来不及逃出的字房工友，便成了兴亚日报的班底。和平后，兴亚日报被一批新人接管，这就是民声报。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民声报的印机、铅字等等，在法律的观点上说应该属于新国民日报的资产。也就是说，它是新国民日报的后身。大概就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民声报初期也就容纳了一些新国民日报的旧人，如李蕴朗、王式民等。我是在一九四六年初，结束了三年多的流浪生活，从新加坡回到吉隆坡之后，经蕴朗先生证明是新国民日报的旧职员，才被收容了去，工作了半年的光景。该报后期听说曾经进行大改组，那时我早已定居新加坡，情形不清楚。若论早期，印象中倒是一间相当商业化的报馆，自由散漫的气氛很浓厚。事实上，它的工作人员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有我们这一批战前就是吃报馆饭的；有日本人的兴亚日报留下來的；有子承父职、代替新国民日报的旧职员来复工的。此外，也有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职业，暂且进来解决生活问题的，如台湾大学生侯斌彦，本地英校出身的李雁宾等等。

我在该报做的是外勤，跑学校和社团新闻，偶尔也兼写体育；却始终与副刊沾不到边。副刊编辑记得一度是吴西玲先生。他是战前的马华诗人，又是战后的报坛红人，我却是个难民似的被收容者，虽然也是姓吴，但此吴不是彼吴，地位悬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不但没有编过副刊，也从未在该刊投稿；倒是有过两篇短文投给星洲日报的「晨星」。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只因为我动辄爱发牢骚，写文章不大严肃，相信西玲先生也不会欢迎，所以就寄到林健安那儿找出路了。但这样也不大好，易于引起某些同事的误会；记得式民先生就对我透露过：「你的牢骚怎么这样多？他们哭父哭母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没有追问，直到今天还是莫名其妙。

同年年中过后，式民、蕴明、侯斌彦等几个人合资创办中华晚报，我也就离开民声，过中华晚报当外勤。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李雁宾等人也离职了。李是跳槽中国报的；最初是记者，后来升了采访主任，最后似乎继宋韵铮为总编辑，已于数年前逝世。

然而中华晚报的发行却没有李雁宾的事业那么一帆风顺。它只出了三个月就收盘了，几乎连薪水也没得发。本来，中华晚报的阵容，也不见得差。主编兼电讯编辑王式民，翻译侯斌彦、卢曜（当时刚进入报界做事），本坡新闻编辑李蕴朗、副刊编辑杜连孙，这应该是相当理想的配搭。外勤方面，除了我跑商会和社会新闻算是滥竽充数之外，曾正写体育，罗雄标跑政府机关，也都属一时之选。只可惜大家偏偏没有想到一点：那时候，连大都会新加坡也还不太够条件出版晚报，吉隆坡那么一个小市镇，晚报又怎么能够生存呢？于是，中华晚报出版的当天，就注定了它的一败涂地的命运。

中华晚报关门之后，侯斌彦似乎回了台湾，蕴朗和我远徙星洲，式民转返民声报做了一个短时期，卢曜偕杜连孙进新闻部办观察报。后来，王、卢、杜三位也都来到了新加坡。这样，中华晚报的几个旧同事，就在新加坡各自走了一段漫

长的人生之路。其中，卢曜先生的成就最高，他考取了伦敦大学的学位，最后当了南大副校长。李蕴朗和杜连孙也能在文娱界和教育界各展所长，一度是独当一面的人物；李还学到能用英文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杜的英文和日文亦搞得更加精熟。最没有出息的是我，祇能埋在旧纸堆里，东抄西袭，编写一点史料。最不幸的是王式民，他本来也和其他几个人一样，对于政治全无兴趣，不知怎的，却于五十年代中期(?)举家北迁、移居广州，结果于一九六六、六七年间，被一群横行霸道的人害死了。这是一个极其杰出的翻译工作者，中英文的程度都非常好，翻译电讯的时候就象一架机器在搬字过纸，但见他手执电报，笔不停挥，顷刻而就，不易一字，速度之高，我还未曾见有那一个人可以相比。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材，不料竟然不明不白地遭了横祸。想到故人的惨死，我自己三数十年来的一切困顿颠蹶，反而完全成为微不足道的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六日·新加坡)

方修编著书目

著 述

- 论小品散文 (世界书局 · 1957)
马华文坛往事 (香港星云出版社 · 1958)
红楼梦简说 (青年书局 · 1960)
避席集 (文艺出版社 · 1960)
文艺界五年 (世界书局 · 1961)
马华文艺史料 (四海书局 · 1962)
马华新文学史稿 (上、中、下 · 世界书局 · 1962——
1965)
文艺杂论 (星洲书屋 · 1964)
文艺杂论二集 (星洲书屋 · 1967)
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 1970)
长夜集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 1973)
轻尘集 (香港中流出版社 · 1974)
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 1974)

马华新文学简史(万里书局·1974)

沉沦集(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5)

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下·世界书局·1975——
1976)

文艺界又五年(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6)

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6)

人物篇(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6)

炉烟集(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7)

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非卖品·1978)

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麦唐纳博士、生田博士合译·
日本东洋文库出版·1978)

小休录(洪炉文化企业公司·1978)

纂 辑 者

陈炼青文集(香港南洋文艺出版社·1962)

迎春小唱(以今遗著·沈秀玲印行·1967)

马华新文学选集(世界书局·1967——1970·共四
册)

小说(一)

小说(二)

戏剧

诗歌

马华新文学大系(世界书局·1970——1972·共十册)

理论批评一集

理论批评二集

小说一集

小说二集

诗集

戏剧集

散文集

剧运特辑一集

剧运特辑二集

出版史料

血颂（李蕴朗遗著·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5）

郁达夫抗战论文集（世界书局·1977·列入林徐典主编「星马报人丛书」）

郁达夫选集（与张笏合编·万里书局出版·1977）

王君实选集（与叶冠复合编·未印）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上海书局·1979·已出二种）

铁抗作品选

张天白作品选

编辑或校阅者

椰林短曲（以今著散文集·世界书局）

停晷集（叶冠复著散文集·世界书局）

短书集（欧阳攀龙著论文集·世界书局）

椰笛与竖琴（莎茄、蓝金合著诗集·世界书局）

生命的航程（梅拉著小说集·世界书局）

投资（李过著小说集·世界书局）

学成归来（谢克著小说集·世界书局）

残梦（丁之屏著中篇小说·世界书局）

阴影（黄山著小说集·世界书局）

选 定 者

阳光普照（姚鱼著小说诗歌合集·洪炉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原甸选集（诗选·万里书局出版）



贺徐典兄调升正教授

厚今风气著先开，又见都堂赏俊才。
翰苑丰仪谁得似；惇惇儒者蔡元培。

（一九七八年二月）

（注）林君于一九六六年任星大中文系代主任，
即开设「马华新文学」课程；为星马各大专院校最早
创立此门功课者。

~~~~~  
〔附录〕

和方修先生贺林教授诗

望海楼主

先秦研究声名开，大学讲坛展俊才。  
领袖词林马太守，莘莘胄子赖栽培。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稿

注：马融，字季长，东汉著名教育家。曾为南郡太守。史称其学博才高，授徒数千人。当时名人多出其门下。又，胄从肉，胄子，天下之子弟也。

## 续得二绝句赠徐典兄

### (一)

登高能赋大夫才，怪得春风报喜来。  
更爱云衢有健翮，日和平楚不曾摧。

### (二)

白虎论经多茂材，班郎格调最崔嵬。  
艺文新志杀青近，合为故人一举杯。

(一九七八年二月)

## 沁园春（感怀）

廿载耕耘，不赶科场，不要虚名。

愿罗浮官下，长充木石；

兰台馆外，永作园丁。

文事勾沉，艺林月旦，辨伪存真是准绳。

慕良直，对千秋百代，识者公评。

文风卑薄堪惊！总见责，帮理不帮亲。

笑满怀恨毒，含沙射影；

连篇谗诮，疑鬼疑神。

旧识成仇、新交反眼，得志小人更横行。

浑余事，任小楼一统，自遣阴晴。

（一九七八年三月）

## 沁园春（却寄）

大笔如椽，略失夸多，稍欠思精。

看欲擒故纵，先扬后抑；

陈源战谱，旧版翻新。

挥了猴拳，飞来螳腿，却道招呼自己人。

叹末世，谁认真检讨，正视批评？

年终结算损赢。祇称许，篱花三数茎。

凡君家功业，对门风水，

他山有石，照写黄庭。

丑角诤词，热心谏论，泾渭分的须划分。

再劝你，辨大非大是，小怨小恩。

（一九七八年三月）

〔附录〕

沁 园 春

岑 兹

——和方修先生感怀韵

老骥骧骧，是初克躁，是实非名。

算滋兰九畹，难排萧艾；

成蹊桃李，应待传薪。

折戟沉沙，台边磨洗，为识仿真忍劳辛。

捡吉羽，对汗青千载，慧眼品评。

恶风侵世莫惊！续持尺，量古再衡今。

叹才荃蘂蛄，忘知顾影；

瑕瑜倒置，捣鬼牵神。

直道不孤，倾襟何数，只有蟹螯爱横行。

多少事，但登高望远，雨霁天晴。

按：岑兹先生是书法家，谈书法理论娓娓动听，谈文学现象就似乎隔了一层。其实拙词两首，都是一年多前联邦一场文艺论争的余波的产物。去年年底，L先生寄来一册新著，其中「论战新诗」一辑，有二首是写给我的，读后觉得有趣，也就回了两阙沁园春。因为想到每次报导一场什么笔墨官司，纵然只做文抄公，搬字过纸，也难以双方面都讨好，结果总得要得罪了一些人，失去若干新交旧识，所以不免有点感喟。如此而已，并没有严重到对于搞文艺失了信心。

方修

七八年四月

## 即兴二题

### 食红毛丹有感

见说前身出岭南，逾淮却逊三分甘。  
平生看惯浮云变，何敢苛求五月丹。

### 新山买榴莲口占

忆昔未闻有艾西，果王啖惯便凄迟。  
如今游客须签盖，祇恐流连误归期。

（一九七八年四月）

## 题画二首

### 题檳城C君所贈農事圖

大地乾枯春草黃，農夫農婦救秧忙。  
從知聖代田家樂，都是詩人作文章。

### 題柔州T君所贈熟食巴剎圖

大排小食盡登場，得暇何妨多徜徉。  
雞粥魚生福建面，羊蹄蝦餅果條湯。  
生鍋雜錦廉還美，死蛤叻沙辣亦香。  
巨厦漸增天然減，來年無此好風光。

（一九七八年四月）

## 〔红楼梦新证〕书後

脂芹身份闹腾腾，叔侄舅甥讼未清。  
既有堂兄备一格，何妨孀妇亦争鸣。  
于今天下皆诸葛，当日谁家集大成？  
更笑嘴尖舌薄客，前人树下噪新晴。

一九七八年四月

---

### 〔附录〕

读「红楼梦新证」质疑

· 望海楼主 ·

朽物一枚畸笏叟，那堪等划史湘云？  
敦诚杂咏年华误，明义赋诗回目分。  
白首双星如属实，青丝新妇作何云？  
漫谈千古奇缘事，叔是脂兮侄是芹！

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二日

注：余昔年邻居，畏友梦楼女史，自少酷爱「红

楼梦」。近十年来，旁及「红学」诸多研究文字，颇有心得。见余所作「读『红楼梦新证』」诗（见七月廿八日「文化」版），略有微辞；谓：「评价太高了！」继之出语连珠，举多事相质，余哑口无言以对。余非「红学」专家，无意寓文学考证于吟咏。以上诸事，皆为梦楼女史所授意。周汝昌氏远在数千里外，难以当面质疑；质之本地「红学」专家可也



## 答 寄

敢将俗墨扰凉天？文债逼人情债缠。  
羞说讲堂卖钟点，忍言著作赔车钱。  
亦工亦学两不象，多病多灾岂偶然。  
一统楼中晦气重，尚余樽酒待诗仙。

（一九七八年五一节）

~~~~~  
〔附录〕

寄所寄

望海楼主

奋铎南天盛意勤，振聋发聩功于群。
讲堂嫌狭追平伯，著作等身沫若伦。
避席何曾思避席，沉沦那见事沉沦。
参商相隔神交久，灯下几时听论文？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稿

闲读杂咏（四首）

（一）

文艺繁荣恃批评，汗青历历记分明。
流氓才子改风格，费厄泼莱终缓行。①
辱骂敌人岂战斗？包容坏种揭相轻。②
他山粗石可攻玉，莫把诤言当恶声。

（二）

未必文场如战场，兵家胜败总平常。
论争无谓计荣辱，评理原非拼弱强。
扑空正误存典范，袭来事例更辉煌。③
造谣诿过西崽子，盗得大铃也灭亡。

（三）

文事艰难古及今，真诚战士不哀吟。
飞沙抚血传华盖，煮肉译经铸二心。

逸乐几人曾不朽？攀登终极见高岑。
劝君勿信生花笔，可向沙龙座上寻。

(四)

艺匠学人重晚芳，磨光刮垢亦寻常。
放歌螺海阮章竞，标点汉书顾颉刚。④
一部柳文添指要，连篇方物写香江。
先知后觉因人异，功罪由来总考量。

一、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曾遭鲁迅批评，指为才子加流氓。

二、鲁迅语：「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于当时周起应等人的行为的批评。

又，「且介亭杂文」曾七论「文人相轻」，对当时流行的所谓「文人相轻」的论调，有很中肯的批评。大意是说，「文人相轻」云云，实在是在包庇一切坏种。

三、在庄子与文选问题的争论中，鲁迅曾误记「颜氏家训」的内容，后来发表「扑空正误」，向读者承认错失，充份表现其认真与负责的精神。

又，「袭来」事件，见「集外集」。一个学生（杨树达）患了精神病，闯进鲁迅的寓所，言行乖谬，鲁迅以为他是蓄意装疯，特地来捣蛋的。后来为了消除误解，鲁迅要求第三期的「语丝」特别增加两页篇

幅，由他负责印费，刊登杨树达的朋友的稿件。他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应该由我自己来喝乾」。并且承认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但这些都无损于鲁迅的伟大。

四、闻早年与鲁迅大开笔战的高长虹，晚岁易名阮章竞（？），改写童话诗。我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里面，读到他的一首「金色的海螺」，其他情形则不得而知。

（一九七八年五月）



水调歌头

——读〔比利自传〕

村镇擦鞋仔，
寰宇足球王。
征路漫长曲折，
回首说辛酸。
怪道天才电脑，①
为有布球陋巷，
少小已痴狂。②
能将岂无种？
男儿更自强。③

戒抽烟，
戒喝酒，
戒荒唐。
又加一戒，
不读吹捧大文章。④
廿载惊心伤杀，⑤

三度金杯定鼎，
千箭庆穿杨。⑥
成功凭毅力，
非关祷上苍。⑦

(一九七八年五月)

①「比利自传」的作者(笔录者)在「导言」中称赞比利是一个天才，说他的脑子里好象有一架专用的电子计算机。

②比利少时，热爱足球，但家境穷困，买不起皮球和鞋子，只能和一批穷孩子在贫民窟的陋巷里赤足踢破布球。

③比利的父亲也是一名足球骁将，可惜运气不好，终生郁郁不得志。

④比利成名前，曾接受过长期艰苦严格的训练。他的恩师禁止他看报章上的捧场文章，以免骄矜自满，妨碍进步。

⑤球场上不时发生严重的杀伤事件，比利的母亲一直为他担惊受怕，多年来从未在电视机旁观看球赛的现场播映。

⑥比利射进他正式球赛生涯中的第一千粒球时，球迷曾狂热庆祝。

⑦比利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赛期间，几乎每晚举行祈祷。他认为他的三捧世界杯，是天主所赐。

再 答

沉沦一卷早名家，祇为迟疑种怨嗟。
不向风沙游旷远，终教憔悴客天涯。
乱离漫唱埋踪易，绝笔重吟浩气加。
长愧穷愁搜检懒，鲁鱼亥豕多瑜瑕。

（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二日）

〔附录〕

再寄

望海楼主

达夫惨死讯难诘，今有高贤搜逸篇。
文集新编供月旦，遗诗再辑冀诠笺。
生花妙笔记游兴，犀利毫端政论鲜。
伟作千秋万世业，多刊名著广流传。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六夜稿

三 答

半归群力半天功，拾得前贤诗几筒。
简说红楼悔少作，重编旧史叹时穷。
杂文已过卅年代，谣诼中兴一枝红。
竖子羞谈显名事，擂台三尺尽英雄。

（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五日）

~~~~~  
〔附录〕

三寄

望海楼主

才高天妒词章遗，南社重传亚子诗。<sup>①</sup>  
三卷精评文学史，一篇简论红楼迷。  
杂文偶见千军笔，谈艺曾经假虎皮。  
伟绩丰功著翰苑，阳秋皮里继风规。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稿

①：指郁文。

## 四 答

聂政荆轲去不还，新潮牛仔最时鲜。  
但从铅槩献绵薄，未得身家学古贤。  
补阙拾遗我有兴，铸词炼句君精专。  
打油只为牢骚盛，怎比东坡与屯田？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  
〔附录〕

四 寄 二 首

望海楼主

其一

信陵救赵济人急，齐国仲连善释纷。
赠剑徐君信季札，赐车食客豪田文。
荆轲聂政重然诺，郭解朱家慕义芬。
薄海共钦吴泰伯，坡公才调更无伦。

其二

才华横溢谁如君？信手拈来皆妙文。

七步感怀曹子建，八叉即景温庭筠。
曲从白雪谐新调，词有阳春奏雅论。
想见当年姜白石，令人追忆柳田屯。

一九七八年五月卅日稿



贈甄供先生

愚公去后阮嵇狂，
停未喚誰話蒼涼？
却喜甄生勤垦植，
一畦新綠稻花香。

「文艺春秋」编者甄供先生，为充实副刊内容，广约各地作者撰写文艺论文。余疏懒已久，无以应命；仅得打油诗一首，聊以塞责。或亦可充补白，凑凑热闹乎？

（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七日夜）

阅报偶得

何必崇陵香火稠？当年一檄照千秋。

墓前几个伤心客，不见凌烟见废邱。

近阅报载，五四元老蔡元培，一九四〇年初病逝香港，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共坟场，迄今三十余年，知者渐少。而墓地萧条，香火冷落，曾引起一两位香港诗人的感慨，似乎颇替蔡氏不值。

其实，蔡氏凭他当年那篇「复林琴南书」，已经足以不朽。这篇重要文献，早有许多载籍辑存，史家也都给予高度评价，稍为涉猎中国新文学史的青年学生，几乎无人不知。墓地的宏丽或隘陋，实在不关重要。鲁迅说过：「人，如非活在活人的心中，那才是真正死掉了」（大意）。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

红学读书记(一)

族谱宣宜一笔差，冤魂迷失在荒遐。

周家兄弟能还魄，赵府夫妻不信邪。①

道姓提名神气足，旁征博引版权除。

于今水落石头出，气结新潮红学家。②

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嫡亲祖父曹宣（后因避讳改为曹荃），字子猷，最早见到的文献说是「曹宜，字子猷」。由于官书族谱，抄刻错误，曹宣变成了无主冤魂，迷失了一两百年。直到周汝昌作「红楼梦新证」，才与乃兄佑昌进行研究，根据诗经的「秉心宣犹」等语，考证了出来，使到曹宣的游魂，终归本主。

（曹宜是曹宣的堂弟，和曹雪芹的关系疏远得多了。）

周氏这一方面的考证，非常精巧，不愧是科班出身的红学权威。但由于他的证据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还未得到历史文件的验证，于是有些红学家就大表反对。特别是「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赵冈伉俪，

根据较后发现的「五庆堂谱」，坚持「曹宣」不合法，「曹荃」才合法，「应该直接了当用曹荃一名」，「不必再追究曹宣一名」（「红楼梦新探」上篇。页十七）。言下之意，颇怪周氏庸人自扰。

然而近年发现的康熙廿三年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却清楚地写着「仲子宣，官廨生」，直接证明了周氏早年考证的正确性——曹雪芹的嫡亲祖父确是曹宣。（见香港中华版「曹雪芹与红楼梦」，冯其庸「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

②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修订本，曾谈到一些红学家：「从拙著中转贩资料和见解，助成其大文时，不加称引，好象他自己所得（但我可以判断他未见原件原刊），到我的论点于他不利，他要借口进行讥嘲笑骂时，却绝忘不了提名道姓，大放厥词。对于这种『学术』作风，我觉得是不怎么令人起敬的。」（页一一二七）

这种红学家，我想也许可以称为「特种红学家」或「新潮红学家」。

（一九七八年六月）

红学读书记(二)

王李昔年考据严，连生遗腹是曹霭。
名花倾国重来比，二手天才一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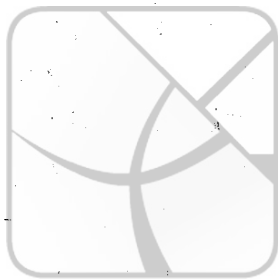
雪芹有弟名棠村，曾为红楼作序文。
遗腹何来丁口旺，一家读者待高论。

最近看了一册「红学一家言」，其中有篇文章大谈曹雪芹是曹颀（连生）的遗腹子，言下颇有得色，视为一大发明。其实此说并不新鲜。多年前王利器李玄伯诸氏已有同样主张。所以此书作者至多祇能算是将花来比女人的第二个天才而已。

不过这第二个天才也不易为。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得解决。根据脂批，我们知道曹雪芹的书，其弟棠村曾做过一篇序。如果雪芹是遗腹子，怎么可能还有一个令弟呢？既然标榜「一家言」，总须有个交代才对。譬如说脂批的话不可靠；说曹颀的遗腹子是李生的

；或者说这个曹棠村是过继的，并非雪芹的胞弟……
…；诸如此类，这才能够勉强自圆其说。然而该文对此似乎存而不论，没有一字道及，那就使人觉得这个「一家言」的书名，未免太过夸张了一点。但也许作者已经有所讨论，只是我自己漏读了，也说不定。

（一九七八年六月）



红学读书记(三)

道是平心心未平，老爷气急发雷霆。

红楼研究开生面，克敌全凭三字经。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修订本的后记，提到旧版本的批评高鹗问题，有一段话说：「不料那么一点肤浅的批判，却触怒了一位洋式老爷——我指的是林语堂。说也奇怪，不知怎么搞的，我这里批高，那里林老爷却怒火十丈，暴跳如雷。到一九五八年，更炮制刊出一篇大文，题目叫『平心论高鹗』。……文中对我破口大骂，并且辱及先人。」

查林语堂「平心论高鹗」的大文中，引了周汝昌乃兄周辑堂为「红楼梦新证」写的书跋的一句话：「（现在书要出了）惟有父亲母亲竟不加等待……」，然后把周氏兄弟之父比作贾政，又假借曹雪芹之口来骂周辑堂为「败类」「家伙」。这一招的确越出了辩论的范围。难怪吴世昌也在「红楼梦探源」（英文本）中代抱不平。

（一九七八年六月）

红学读书记(四)

藩邸私奴地位卑，皇家世仆上高枝。

包衣不冠内务府，知是鹑衣抑锦衣？

内府包衣是内勤，汉军旗族属官军。

乾嘉文士已淆混，难怪新潮伤脑筋。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先辈的出身，其正确名称在红学研究上也发生过一场论争。周汝昌认为应该叫做「内务府正白旗」，或「内旗鼓满洲正白旗」等。「包衣」、「满洲」在已标明「内务府」、「内旗鼓」时则可省，如果根本不书明「内务府」等字样，径说他们是什么「汉军旗」、「正白旗汉军人」等等，乃是十分错谬的。

由于汉人对于旗制不大熟悉，清中叶以后在这方面的记载已经颇多混乱，所以周氏的「红楼梦新证」辟有专章辨析。

但也有若干红学家对周氏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坚持应该或至少可以称曹家作「汉军旗」。因此周氏的「红楼梦新证」修订本的「辽阳旧房」一节，特别作了一篇附记，补充他的论点。其中答复赵冈的一段比较详细，节录如下——

另一家说：「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称曹雪芹是『内务府汉军正白旗』（按此家很聪明，他把带「内务府」的列在最前面了），清史文苑传称曹寅是『汉军正白旗人』，这些都没有错。如果说曹家是『正白旗包衣人』也对。这只是同样一种身份，在雍正以前及以后的两种不同名称」云云。（「红楼梦新探」上篇页九）……我要问一问：当他还不知道曹家是内务府包衣旗的时候，他只看了「清史文苑传」的「汉军正白旗」云云，是怎么知道这一实质「身份」，竟然和内务府包衣旗是……「同样一种」呢？

……后一家又说：「如果说曹家是正白旗包衣人也对」。那意思是：说成「汉军正白旗人」的不但「没有错」，而且比「正白旗包衣人」还要更「对」些。我不禁叹佩，这位研究者在行文之际是很擅长史法曲笔的。但是，单说「汉军」某旗，和内务府包衣旗是井水不犯河水。「正白旗包衣人」也并不就「对」。单说「正白旗包衣人」，实不甚通，而且确是很混淆的。除非其情形是发生在类如「满洲氏族通谱」这样的书中，那自然就很清楚正确。「汉军」字样，如果

上面是冠以「内务府」的了（如英浩书法），还可以勉强算半通半不通；上面全不冠以「内务府」等字样的，就只能是指汉军旗，（后来也特别标明曰「八旗汉军」）与内务府，与曹家了无交涉。

……汉军旗的原称「乌真超哈」，其义是「重兵」。实指明末投降清人的掌握西洋式大炮火力的兵种。而内务府包衣的意义是「皇帝管家的奴仆」。二者在历史来源和实际编制上都一清二楚，各自为政。现在的研究者力主内务府中可以有「汉军旗」的，等于说皇帝管家中有着拉着红夷大炮的乌真超哈，宁非异闻？

（一九七八年六月）

红学读书记(五)

三月二书忙赶工，尽删碍语邀丰功。

专家不解其中意，象鼻象身摸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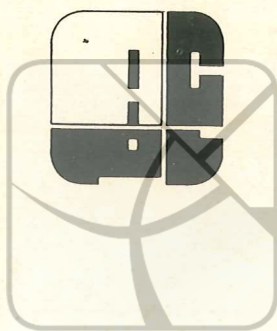
一七九一至一七九二年，程伟元和高鹗在相隔七十天的期间内，对前八十回红楼梦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删改，并连同他们「所补」的后四十回，两次予以印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程甲本和程乙本。据孙逊的「评后人对红楼梦的篡改和歪曲」（香港中华版「曹雪芹与红楼梦」）指出，这两个本子除基本上承袭了「晋脂本」对原作的大量删改之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前八十回作了数以万字计的增、删、改、移，其中程乙本的篡改又尤甚。

如小说第三十六回，贾宝玉有段关于「忠君」的议论，原来是：「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此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

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程乙本将其中「竟何如不死的好」一句，改为「便只管胡闹起来」。最后一句「这皆非正死」，则完全删去了。显然，程高的热心印书，赶工改版，意图是不简单的。

向来不少红学家对于程高两人何以要在七十天内印出两个版本来，费尽心思，提出各种各样的假定。有说他们的书销路好，所以赶着再版，顺便修改；有说他们责任心强，发现了更好的本子，所以赶快修订；也有说两种版本是用在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区发行的……看来，可能都有点象是瞎子在摸象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七日）



Published
in
Singapore

S\$2.00
